Co-China 周刊

NO. 149
2014年4月11日

樊诗芸：印度告别"辛格十年" | 帕拉维·艾亚尔：印度记者在中国 | 黄亚生：印度离中国还有多远？



编者的话

史上历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的民主选举在印度拉开帷幕。此次大选投票过程从4月7日延续至5月12日，有多达500个政党注册参选，总计8.12亿印度公民参加了投票登记，政府将耗资350亿卢比（约合51亿人民币）。就选举规模而言，这场印度大选在这个地球上无出其右者。

尽管竞争议席的党派众多，此次大选主要还是三大政治势力的代表角逐印度总理宝座——他们分别是国大党的拉胡尔·甘地、印度人民党的纳伦德拉·莫迪，以及平民党的政坛新秀阿尔温德·科基瓦尔。其中，具有中国人作风特征的莫迪近来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金融时报》分析，这一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印度人希望像中国那样。”

的确，在面临经济发展速度下滑、政府决策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偏差、社会矛盾激化等众多问题的情况下，印度人民似乎正在期待一个更有决策力的领导人上台。看起来，这像是印度模式在中国模式前低头了。不过，事实果真如此吗？

同样历史悠久，同样是人口大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印度和中国走的是大相径庭的两条发展道路。一方面，中国凭借骄人的经济发展水平，快速崛起成为大国之星；另一方面，印度则以其“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体制为傲，自信于“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印度总理辛格语），也因此被认为具备更长远的发展能力。同时，在没有选民、法治、媒体制约的情况下，中国的高速发展隐忧重重；而强势的领导人是否就能解决印度“功能性无政府主义”的局面，也很耐人寻味。两国模式的优劣有待我们去仔细探寻。

对于有能力组织、承载这样一场庞大民主选举的邻邦，我们的了解非常有限。本期Co-China周刊我们就从印度正在进行的大选入手，与读者一起近

距离打量这位重量级的邻居，也尝试在中国模式与印度模式的对比之间寻找一个理性平衡。

Co-China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Co-China周刊

目录

将本刊分享至：












┣选┫

樊诗芸：印度告别“辛格十年”

《东方早报》见习记者。

“

此次印度大选特点不少：选民众多，登记选民达 8.14 亿；历时漫长，将持续 36 天，分 9 个阶段进行。尤其不同寻常的是，“拼经济”成为今年印度大选的主旋律。

”

在经历 10 年“辛格时代”后，印度将迎来新的总理。

昨日，被西方媒体称为世界“最大规模选举”的印度人民院选举正式拉开帷幕。本次选举将产生 543 名议员，同时选出印度政府下一届总理。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已经宣布不以总理候选人身份参选，他所在的印度国大党将面临来自人民党的强有力挑战，民调显示，人民党候选人纳兰德拉·莫迪有望出任总理。

此次印度大选特点不少：选民众多，登记选民达 8.14 亿；历时漫长，将持续 36 天，分 9 个阶段进行。尤其不同寻常的是，“拼经济”成为今年印度大选的主旋律。

年轻选民占近半数

参加此次印度大选的选民创历年之最，从人口密集的首都新德里到人烟稀少的印度洋小岛，将有 8.14 亿选民、500 多个政党、93 万个投票站，1000 多万安保人员，共同经历这场长达 36 天的“马拉松”式的选举大战。

此次参加投票登记的选民人数比 2009 年的大选增加了 1 亿多人。18-35 岁的年轻选民占了全部选民的近半数，将成为左右大选局势的重要群体。印度有一半的人口年龄在 25 岁以



下，本次大选将产生 1.6 亿的“首投族”，其中 2300 万人更是在 19 岁以下，这意味着他们成为合格选民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选举委员会在全国共设立 93 万个投票站，比 2009 年增加 12%。选举委员会说，无法在一天内运作和保卫如此多数量的投票站。在确定投票日期方面，由于多数投票站设立在学校，必须避开学校考试日期。夏日极端高温、雨季、收获季节、宗教节日也在需要考虑的范围内。

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和特里普拉邦定于 7 日投票，揭开整个议会选举的序幕。印度北部山区、沙漠气候的西部地区和热带气候的南部地区将先后投票，最后是人口稠密的北部平原地区。

投票定于 5 月 12 日结束。计票工作定于 5 月 16 日举行，选举结果预计同日揭晓。

“拼经济”成大选主旋律

印度为联邦制国家，议会实行两院制，分为联邦院（议会上院）和人民院（议会下院），大选指的是人民院选举。在人民院选举中，赢得下议院全部 543 个席位半数以上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有权组建内阁。

参与此次竞选角逐的主要有四大势力，除了国大党（INC）和印度人民党(BJP)这两个全国性大党外，还有“平民党”(AAP)和 2 月 25 日宣布成立的尚无正式名称、包括左倾政党在内 10 余党的新联盟。

印度知名民调机构“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友有望在选举中获胜，但难以赢得过半席位，这种情况下，最可能出现一个由印度人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国大党和人民党为印度政坛传统两强，但 20 年来，两者在历次议会选举中都没能独立获得绝对多数席位。

在以往的印度大选中，压倒性的主题通常都涉及种姓、宗教或族群等政治认同问题，经济议题向来罕唱主角。而在这次大选中，虽然政治攻讦仍然存在，但无论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抑或是较小的平民党，都不约而同把经济议题作为吸引选民、一决高下的主阵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主任赵干城表示，无论哪个党派当选，在外交政策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民众对国大党“不买账”

现年 44 岁的国大党副主席拉胡尔·甘地是该党的总理候选人。拉胡尔是前总理拉吉夫·甘地之子，是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第四代接班人，他的母亲索尼娅·甘地现任国大党主席。虽然拉胡尔是未来印度总理的潜在人选之一，但不少分析师认为，他清楚自己这次获胜希望不大。



拉胡尔在其祖母、父亲相继遇刺身亡后弃商从政，从英国回到印度，参与竞选议员。2004 年国大党在索尼娅·甘地的领导下击败人民党，重新夺回了全国政权。2013 年开始，拉胡尔逐渐从母亲手中接过甘地家族的权杖。今年 1 月，国大党宣布副主席拉胡尔将领导该党参加大选。但在印度民间，拉胡尔还没有拿到具有绝对把握的支持度，有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只有 32%。

赵干城指出，国大党 10 年执政的后期，经济积累了一定的问题，政府赤字加大，物价飞涨，就业压力增大。尽管在辛格政府的努力下，物价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普通老百姓并不买账，“对印度的贫穷人口来说，抑制物价并不是政府的政绩而是责任。”赵干城表示。

新华社分析称，过去 30 年，印度经济平均增幅达到 6.4％，2002 年到 2011 年甚至达到 7.7％。但是近一两年来印度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经济增长降至 5％以下，物价上涨，外资撤离，卢比贬值，加上腐败案频发，让印度人对国大党的信心大大动摇。

人气最旺的人民党

去年底，在包括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多个地区的地方议会选举中，人民党成为最大赢家。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结果巩固了莫迪的地位和声望，为其在 2014 年大选中积累了人气。

现年 64 岁的莫迪眼下已成为印度国内的政治明星。他讲求实干，连续三届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在他带领下，被称为“印度的广东”的古吉拉特邦经济增长率创各邦之最，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外国企业投资尤为突出。去年 9 月，人民党议会委员会提名莫迪为该党 2014 年大选总理候选人。莫迪在竞选中以古吉拉特邦发展模式作为案例，宣扬经济自由化和改革的主张，打造自己高效率、有决断力的形象。

但为民众诟病的是，莫迪有宗教民族主义倾向，未能妥善处理 2002 年古吉拉特邦暴乱。数百名穆斯林在暴乱中身亡，但莫迪拒绝为此事道歉。执政的国大党警告，如果莫迪执政，印度可能发生暴力事件。

赵干城指出，由于人民党在经济上奉行自由主义政策，若能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将会在国内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就外界诟病的“民族主义”倾向，赵干城认为，2002 年的古吉拉特邦暴乱已过去多年，西方政府不太可能旧事重提，若人民党当选后，其民族政策有可能改变。

最先投票的印度东北部地区将是对莫迪的一大考验。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是国大党眼下为数不多的“票仓”之一。在以茶叶种植为主的阿萨姆邦，许多选民依靠国大党出台的福利项目。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在这一地区，近半数选民几乎肯定将支持国大党。一些选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未听过莫迪的名字。



高呼反腐的平民党

平民党是近年来印度反腐运动中催生的一个政党。其创始人阿尔文德·科吉里瓦是印度反腐运动代表人物安纳·哈扎雷的高级幕僚。

2012 年 10 月，科吉里瓦成立平民党。在反腐的口号下，平民党迅速获得来自贫民和城市居民的支持。去年年底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平民党脱颖而出。

科吉里瓦提倡廉洁清明的政治，批评自由化使得政府更加偏向于大企业，痛斥这是以牺牲穷人来换取富人的更加富裕。不过作为政坛新秀，科吉里瓦的短板也显而易见。有分析称，由于势单力薄，几乎没有从政经验，科吉里瓦要在选民中赢得足够多的选票非易事。

赵干城表示，此次选举中第三大党平民党能否成功获得 100 席，与国大党或人民党结盟，从地方性政党一跃成为全国性政党，将成为此次选举最大的看点。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Co-China周刊

印度大选——谁能阻挡纳伦德拉·莫迪

“

难怪印度人民党的纳伦德拉·莫迪会成为印度下任总理的不二人选。在其国会政党对手看来，莫迪跟拉胡尔·甘地截然不同。莫迪以前是个茶叶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靠自己的能力。不管他是否愿意掌权，甘地似乎都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而莫迪在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任上展现出发展经济的能力，他也能带动印度经济发展。甘地的阵营深受腐败污染，而相反莫迪这边的家底很干净。

”

【导读】

所有人都应该关注一下纳伦德拉·莫迪这个人。因为他很快将接替自建国起就执掌印度的国大党以及尼赫鲁·甘地家族。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唯一的关注点，因为莫迪此人还是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分子，2002 年曾犯下纵容和教唆残杀穆斯林的罪过。此人一旦上台，很有可能带来印度国内的新一轮种族分裂和对抗。但印度人选择他就像当初德国人选择希特勒而抛弃魏玛政府一样，因为莫迪很会搞经济。在印度日益混乱的社会现实下，民众已经顾不了这许多。而这样的状况的确令人警惕。

对于即将大选的印度，谁人不对其前景感到惊讶？从 4 月 7 日开始，农村文盲和贫民窟的穷光蛋将和孟买的百万富翁一起平等地选择他们的政府。近 8.15 亿印度公民将有权在 5 周内的 9 轮投票中投出自己的一票，堪称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民主活动。



不过，也不是没人谴责印度政客的无能与唯利是图。这个国家满是问题，而在国大党执政的十年里整个国家已然群龙无首。经济增长率下跌了一半，只有 5%，这个数字已经低到不能为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印度年轻人提供工作。改革失败，道路与电力已然未果，儿童辍学。同时政客与官员则在国会任期里大肆收受贿赂，其总额达到 40-120 亿美元。在印度人眼中，腐败就是政客们的主营业务。

难怪印度人民党的纳伦德拉·莫迪会成为印度下任总理的不二人选。在其国会政党对手看来，莫迪跟拉胡尔·甘地截然不同。如果按照君权神授的世袭做法，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曾孙将接任总理。莫迪以前是个茶叶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靠自己的能力。不管他是否愿意掌权，甘地似乎都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而莫迪在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任上展现出发展经济的能力，他也能带动印度经济发展。甘地的阵营深受腐败污染，而相反莫迪这边的家底很干净。

莫迪值得称颂的地方太多了。不过，本刊并不支持莫迪执掌印度。

莫迪的憎恶

不支持的原因正是 2002 年印度教徒在古吉拉特邦对穆斯林的迫害，那一次骚乱中至少有 1000 人惨遭屠杀。而穆斯林随后采取报复，在艾哈迈达巴德及其周围的城镇村庄，杀戮和强奸开始上演，最终造成一列火车上 59 名印度教徒惨死。

1990 年，在莫迪的帮助下，阿约提亚建立起印度教圣地。两年后，此地导致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发生冲突，造成 2000 人的死亡。作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印度复兴会的终身成员，莫迪曾在此誓言终身独身。早年他曾发表演说，无耻地煽动印度教徒对抗穆斯林。2002 年，莫迪成为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他被指控允许甚至教唆那次大屠杀。

莫迪的辩护者也有很多，主要来自于商界精英，他们指出两点。其一，包括公信力不错的独立最高法院在内的重复调查都没有找到对莫迪指控的证据；其二，如支持者所言，莫迪已然改变。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吸引投资，振兴经济，不仅维护印度教徒还有穆斯林的利益。支持者称，想象一下，全印度的穆斯林穷人将在一个经济发达的印度收获颇丰。

就这两点来说，莫迪真是人品不错。关于骚乱的调查没有结论，原因之一便是大量的证据或丢失或被人为抹去。如果说 2002 年的事实真相已模糊，那么莫迪的说辞也可以模棱两可。他可以把大屠杀解释清除，最后道个歉；然而他选择了拒绝回答有关问题。在去年的一次罕见评论中，他表示自己对穆斯林的痛苦深感悔恨，这种感觉就像开车碾过一只小狗一样。



两害相并取其轻

“狗笛”政治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可悲可叹的。不过在印度，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绝非表面那么简单。自英国撤出印度，印巴分治之时，就有约 1200 万人流离失所，成百上千的人就此殒命。虽然自 2002 年以来，北方邦的公开的暴力已经平息，但每年依然有上百起事件发生，无数人丧命，暴力规模依然警钟长鸣。导火索还有可能来自于国外，2008 年在孟买，印度遭到来自巴基斯坦穆斯林恐怖分子的袭击，而巴基斯坦可是一个不太安生且手握核武的邻居。

莫迪没有着手去平息穆斯林的恐惧，相反他还在不停撩拨之。莫迪坚持推动反穆斯林投票，令这种对立不断升级。即便是最好时代的印度，不同民族与不同信仰之间虽然满是欢乐，但依然不够和谐，这里既有圣人，但也不乏叛军。他们中最优秀的，比如已故前经济学人专栏作家库什瓦特·辛格就曾痛苦地意识到公共仇恨带来破坏。莫迪很可能入主德里，迟早会搞起对巴基斯坦人的教派屠杀或是掀起一场危机。至少没有一个现代主义者现在对他唱赞歌的，因为大家知道他将干什么，而穆斯林反过来又会怎么对付这个分裂者。

如果莫迪打算澄清自己在那次暴力事件的角色身份，并展示出真诚的悔意，我们会考虑支持他，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在印度这样一个内部分裂的国家里选出一个爱搞分裂的人来当总理，这实在错的离谱。虽然在甘地治下的国大党领导下的政府毫无前景可言，但我们还是认为这是印度的一个次优选择。

国大党赢不了了，但假设如果国大党赢了，那么它就必须得革新自我，改革印度。甘地应该把自己的胆怯收起来，把促进印度现代化提上去。印度民众有太多日益增长的需求。如果且很有可能印度人民党赢得选举，它的执政联盟应该推出其他总理人选，而非莫迪。

要是他们坚持选择莫迪呢？那我们就得祈祷他做好事，我们乐见其用现代、诚实和公平的方法管理印度，进而证明我们现在的假设是错误的。但现在他应该为自己的历史作为承受评判，他依然是个与宗派仇恨有牵连的人物。现代、诚实而又公平，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比这些对印度更重要了。

本文出自《经济学人》杂志

【附注】

甘地家族：尼赫鲁·甘地家族出了尼赫鲁、英迪拉和拉吉夫三任总理，长期统治印度独立后的政界。

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名字还是“圣雄’甘地的功劳：当时，尼赫鲁是北印度的婆罗门出身，而独生女英迪拉却与异教拜火教的教徒结婚，新婚夫妻的姓氏成为问题，于是“圣雄”甘地给了他们“甘地”的姓。



然而尼赫鲁·甘地家族也是一个悲剧频发的家族，英迪拉和儿子拉吉夫先后被暗杀，而拉吉夫的弟弟桑贾伊在飞机失事中遇难。现在拉吉夫 34 岁的儿子拉胡尔·甘地又当选印度人民院议员，像他的祖辈、父辈一样，又开始投身于印度的政坛。

（译生译世翻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和静钧：印度大选与印度民主的成长



国际时政评论家

“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敢对印度的民主投以轻薄之言，在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民族和宗教多元、地理气候多样的这样一个“复杂国家”里，能举行这么一场浩大的选举，已经足以令所有老牌民主国家肃然起敬。

”

从参与的选民人口上看，堪称为“全球最大”的大选，于 4 月 7 日在印度拉开帷幕。近 9 亿登记选民，这样一场大选，使技术上已经不可能如“民主微型国”一样当天投票当天唱出结果，印度大选分为九个阶段，投票从 4 月 7 日开始，一直到 5 月 12 日才会结束，而最终结果将延宕数天才会公布出来。

4 月 7 日第一阶段的投票代表着大选投票季的开始，这一阶段的投票是在偏远和人口稀少的东北部地区开始，是为投票季的开幕式，而 4 月 10 日第三阶段的投票才算正式的角逐赛，当天也被视为首个重要投票日，德里选区、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等多个重要地区投票，将产生占国会议席总数约五分之一的议员。印度人民院共有 543 个议席，只有取得 272 个议席的党或党团才能组阁。

尽管竞争议席的党派林林总总，但本届印度大选也沿袭了过去的风格，呈现出两个松散型的联盟之争：一个是国大党为首的联盟，另一个是人民党为首的反对联盟。国大党依然继承过去的做法，没有推出一个总的领头候选人，而人民党则旗帜鲜明地推出领袖莫迪。不过，舆论却一致认定，国大党潜伏着的未来领袖就是甘地家族的继承人拉胡尔·甘地。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敢对印度的民主投以轻薄之言，在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民族和宗教多元、地理气候多样的这样一个“复杂国家”里，能举行这么一场浩大的选举，已经足以令所有老牌民主国家肃然起敬。十年前，率领国大党从人民党手里夺回执政权的索妮亚·甘地，决定把首相之位“禅让”于锡克教徒曼莫汉·辛格，并且这样的禅让得到



了身为穆斯林的时任总统卡拉姆的支持，代表着印度成为第一个由少数族裔执政的民主国家，这比美国选出黑人总统奥巴马整整早了 4 年。而从民选产生第一位女性总理上看，印度同样也创造了历史。

印度的民主是从真正“一穷二白”的环境上展开的，1947 年独立之时，印度几乎没有任何“民主习惯”，宗教或教派暴力冲突是常态。微弱的民主火种经圣雄甘地的传播，并在尼赫鲁总理在位时执着追求，终于在印度落地生根。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印度国父尼赫鲁是如何小心呵护刚刚诞生的民主体制。有一次，尼赫鲁骂了法官，第二天尼赫鲁做出道歉，并向这位大法官写了一封措辞谦恭的道歉信。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一样呵护着父亲的民主价值，大选失败后坦然接受结果。同样，2014 年大选预计会结束国大党这十年的执政地位。从 1947 年独立起算，除了偶尔被打断外，国大党统治印度累计有 50 年左右。

今天印度的大选更加贴近社会的关注点，妇女权利和针对妇女的暴力犯罪(包括轮奸等在内的性犯罪)，已经上升为最大的社会问题，民意调查发现，这一领域上的关注高于反腐败。去年新德里地方选举中，打着维护妇女权利的一个小党异军突起，证实了这一问题的分量。国大党将被作为保护妇女权利不足的政党而受到选民的唾弃，而人民党是否一定会把妇女权利视为第一优先议程，将会受到选举的考验。

人民党的莫迪起家于古吉拉特邦，古吉拉特邦经济繁荣等成就成为莫迪的一张王牌，而穆斯林选民则在无数次追问莫迪 2002 年穆斯林大屠杀事件中的责任后才会决定究竟把票投给哪个大党或小党。莫迪打出了反腐败的竞选口号，这也迎合印度庞大的年轻选民求变的心理。总之，印度大选后将有新面孔引领印度，莫迪嘲笑辛格是“软弱的领导者”，大选后的印度将会迎来强势的领导人。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印度大选：图解世界最大规模选举细节

印度于 4 月 7 日起启动世界最大规模选举，在 6 周时间内，印度将会有超过 8 亿选民参与到投票中。据了解，大选分为 9 个阶段，投票将于 5 月 12 日结束，预计 5 月 16 日宣布投票结果。英国广播公司（BBC）4 月 9 日通过一组生动的图片，向我们详细解读了此次大选的诸多细节。



印度议会选举逐步产业化，商家做出选举专用手机套吸引消费者



印度选举委员会组织各种活动，鼓励民众都参与到投票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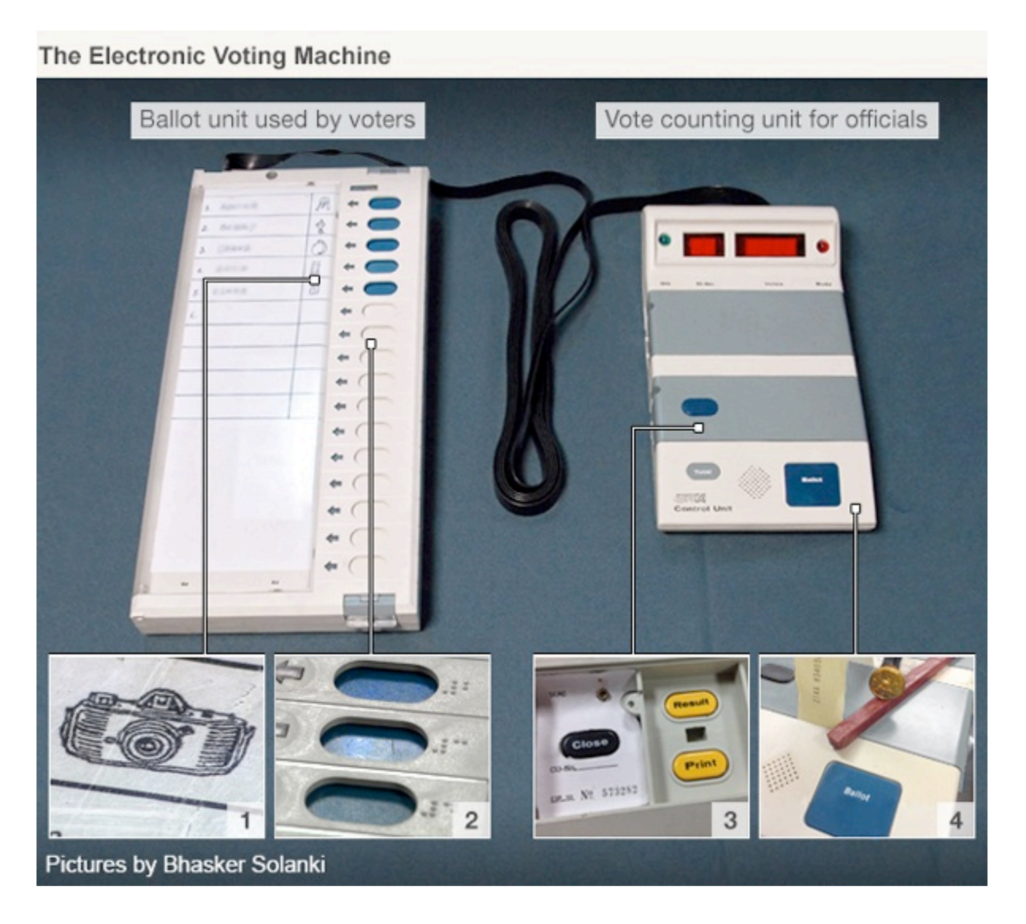


最大规模选举将如何展开？

据悉，在本次印度议会下议院（the Lok Sabha）选举中，印度合法选民总计 8.14 亿人，比 2009 年的上一次议会选举增加超过 1 亿人。选举委员会在全国共设立 93 万个投票站，比 2009 年增加 12%。

本届选举将在印度的 35 个州举行。印度采用选区制，共分为 543 个选区，每个选区将推举一名下议院议员。获得议会过半席位（272 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将有权组阁。

与此同时，此次选举还将选出下一届印度政府领导班子。



无论是否识字，按下蓝色按钮即可完成投票

“投票神器”—电子投票机

本次选举的 93 万投票站将使用图示的“投票神器”——电子投票机（EVM），整个投票过程将在印度投票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

投票时，选民只需按下每个选举候选人所对应的蓝色按钮即可，为方便不识字的选民，选举委员会人性化的使用符号替代候选人的名字和所在政党。投票结束后，机器会自动储存所有投票，由于“投票神器”自带电池，即使在停电的情况下，该投票机也可正常使用。





从左到右分别是：国大党副主席拉胡尔·甘地，人民党领袖纳伦德拉·莫迪，平民党领导人阿尔文德·科基瓦尔

谁是本次选举最有力的竞争者？

本次选举最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是人民党领袖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国大党副主席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莫迪和甘地的竞争也被中国媒体戏称为“草根与高富帅之争”。此外，2013 年崛起的反腐党派平民党领导人阿尔文德·科基瓦尔（Arvind Kejriwal）也备受选民关注。

据了解，64 岁的纳伦德拉·莫迪是一名草根政客，因其管理地区的经济蓬勃发展而广受好评，然而他却有着宗教民族主义倾向，因未能妥善处理 2002 年的暴乱备受争议。

印度不少民调都显示，莫迪的支持率遥遥领先，但是印度的民调常常弄错选举结果。



新兴反腐党派平民党领导人极力宣扬反腐的政治主张

选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在本次大选中，腐败、失业和不断攀升、通货膨胀率、印度摇摇欲坠的经济、女性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等问题都是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据了解，无论是反对党国大党（BJP）还是新兴反腐党派平民党（AAP）都指责执政党人民党未能有效控制印度的腐败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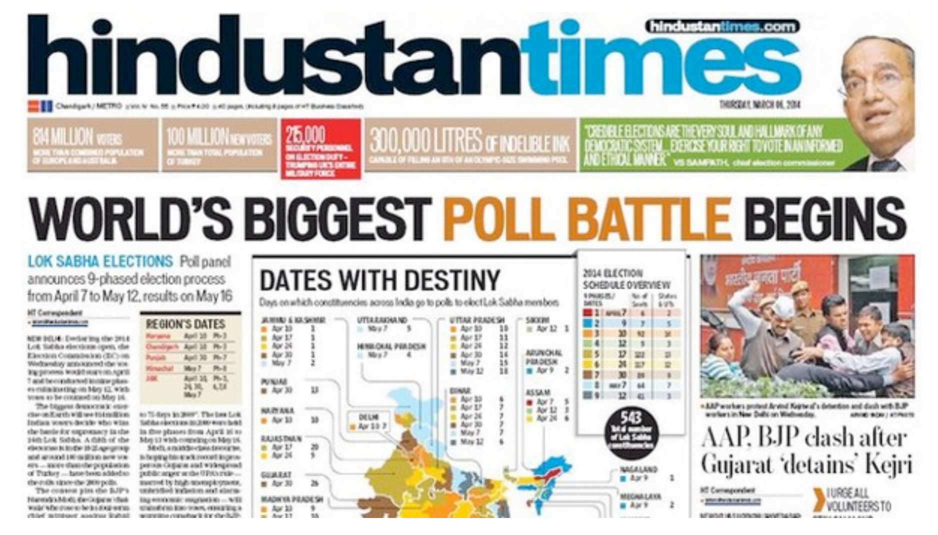


印度首次允许变性人以“第三性别”的形式参与投票

2014 年印度大选有何创新？

本次选举，印度首次允许在电子投票机设立“拒绝为所有候选人投票”的按钮。

同时，印度首次允许变性人选民以“第三性别”的形式参与投票。



hindustantimes

hindustantimes.com

THURSDAY, MARCH 06, 2014

814 MILLION VOTERS

100 MILLION NEW VOTERS

215,000

300,000 LITRES OF INDELIBLE INK

"CREDIBLE ELECTIONS ARE THE VERY SOUL AND HALLMARK OF ANY DEMOCRATIC SYSTEM... EXERCISE YOUR RIGHT TO VOTE IN AN INFORMED AND ETHICAL MANNER" VS SAMPATH, chief election commissioner

WORLD'S BIGGEST POLL BATTLE BEGINS

LOK SABHA ELECTIONS Poll panel announces 9-phased election process from April 7 to May 12, results on May 16

REGION'S DATES

DATES WITH DESTINY

2014 ELECTION SCHEDULE OVER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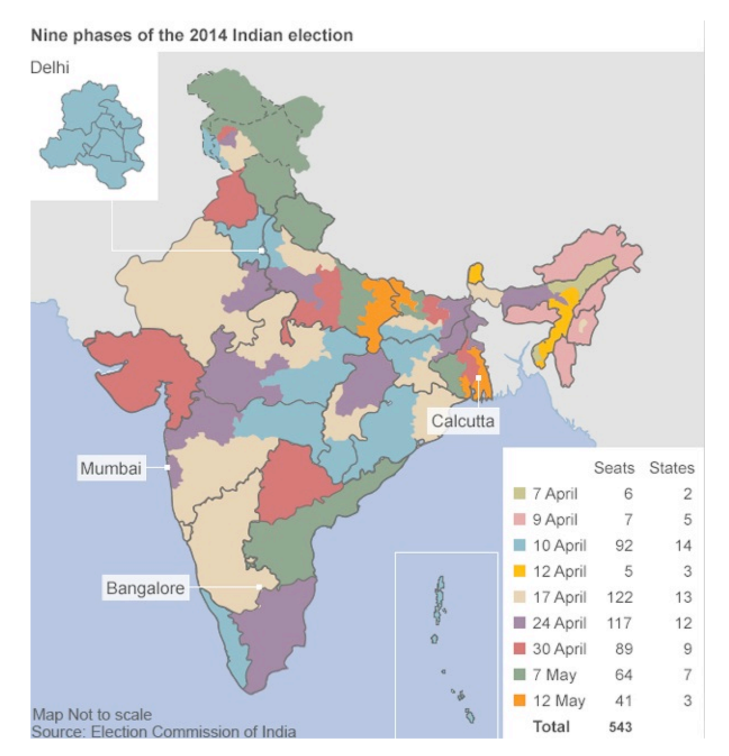
543

AAP, BJP clash after Gujarat 'detains' Kejr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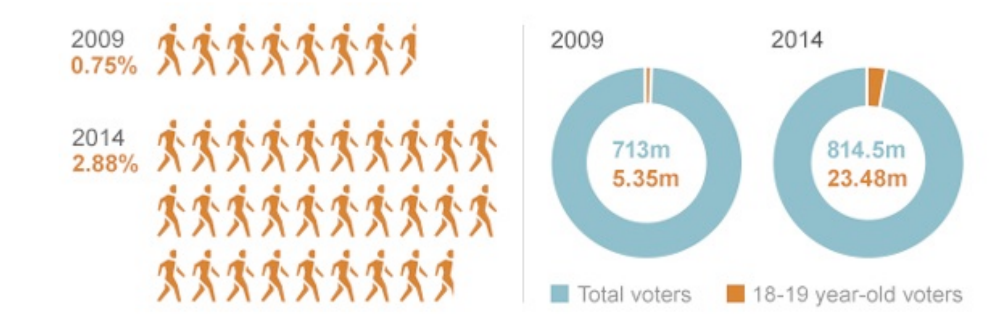
大选获得印度当地媒体的广泛关注，各政党也借机利用媒体拉票



Co-China周刊



2014 年，印度大选各州的投票时间分布



调查显示，18-19 岁的年轻选民在 2014 年印度大选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Co-China周刊

□比□

帕拉维·艾亚尔：印度记者在中国



《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印度记者。

“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样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后殖民国家中之所以近乎独一无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在一个因一种理念而非地理、语言或者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里，这种制度得来不易。这种理念甚至赞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仅可以，而且欢迎同时拥有多种或者一种身份。

”

一

回到北新桥头条胡同，那群麻将搭子仍在小卖部门口，闷热的夏夜里他们会一直玩到夜永时分。其中少不了方老太的儿子，他把汗衫卷起，露出圆鼓鼓的肚子。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无论时间多晚，都能看到这群人都在外面打麻将。在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会停下片刻，然后总有人会轻轻地扬起下巴打声招呼。

他会说“回来了”，我的街坊们用这种一成不变的问候来表明他们知道我回家了。胡同里的问候语带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可预见性。它们表明邻里平安无事，一切正常。

夏天过后，就是北京短促的秋天，要不了多久，空气中就会有烧煤发出的那种不祥气息——那是冬季胡同里的标志性味道。寒冷季节即将到来的其他迹象也初现端倪：一大早，上公厕的人穿的是长袖绒衣，而不再是棉质睡衣。



我想起刚搬到这儿时，胡同里的居民对睡衣的喜爱让我不时皱起眉头。对于睡衣来说，胡同是真正的解放者。不用再局限于卧室，全天都有居民穿着它们上街，而且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经过最初的困惑，考虑到每次要去附近的小商店买个火柴或者什么零碎时穿着睡衣出门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开始变得非常欣赏这种对睡衣的友好态度。有时候，我会带上“焦糖”或者“豆腐” 一起出去。街坊们都非常喜欢猫，我带它们出门的时候，总会有一群人围过来逗它们玩。

一个秋日的早晨，在我从小卖部回家的路上，一群胡同游的外国游客正好骑车经过。他们左顾右盼，充满好奇，脸上挂着亲切地微笑，直到看到了我。其中许多人在那一刻看来都大吃一惊，有一位还差一点从车上摔下来。

刚搬到这里时，我也曾在一些中国人当中引起了同样的反应，住在这儿的人吃惊地发现有一个外人就在他们中间。但我还从来没有在外国人当中引发这种反应。

随后，我以他们的视角打量着自己：穿着一套睡衣睡裤，嘴角叼着烟，左胳膊下夹着猫，走路的时候拖鞋在脚下噼啪作响。胡同已经把我同化了。

2006 年很快过去了，我们迎接着在中国的又一年，那将是我呆在这儿的第五年；房东吴先生打来电话安排吃晚饭的事情。我们有一段时间没一起出去了，四合院的下水道在最近一段日子里也没出过什么毛病。

我立刻答应下来，但我这么做还有着隐秘的目的。之前每次我、胡里奥和房东出去吃饭，毫无例外都是吴先生埋单。这与其说证明了他的好客，不如说表明了我们在中国人吃饭时流行的“抢着埋单”比赛中技不如人。

这是一场令败方大丢其脸的决斗，与吴先生和吴太太相比，我们的败绩令我和胡里奥的脸没地儿搁。现在，补救的机会终于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们和吴先生一家三口坐在一家正宗的川菜馆子里；对着点的菜，我眉头紧锁。“那是什么？是肺吗？”我问道，如鲠在喉。“哦，今晚专门给你们点的。”吴太太露出食尸鬼般的笑容，一边用锃亮的长勺子在热气腾腾的大菜盆中搅拌着。“不光有肺，还有腰子和肝，跟高汤和血炖在一起，加上花椒。”

有那么一刻，她露出了关切的表情。“你能吃花椒，对吧？”她热心地问道。我愁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摇了摇头。说实话，我并非不能吃辣。“那就没问题了。”她松了一口气，接着舀起一大勺灰色的抖动着的肉，扣在我勉强伸出的碗里。

晚饭继续进行。杂碎之后是未经脱骨的牛蛙，所以蛙肉得啃下来，然后吐出小块的软骨。吴先生告诉我们说：“很多人不知道，蛙肉其实是最鲜的。”一副很在行的样子。



让房东挑餐馆、点菜是我们的策略之一。我们让他以为那天晚上是自己做东，等我们吃饱后，胡里奥会推托说去洗手间，其实是溜到收银台把账给结了。待吴先生要结账的时候，我们会得意洋洋地表示钱已经付了，而且在他因为未能结账而垮下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吃到一半的时候，一小块牛蛙进到吴先生的气管，他发出吓人的咳嗽声，紧紧抓住喉咙，这种两栖动物的一片软骨令他喘不过气来。我克制住这是房东让我吃那些东西而遭受报应的想法，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背。但没什么效果。吴先生突然起身冲出包间。我们要跟上去，但吴太太拦下我们，坚持说不用担心。“老吴身体好得很，”她说。“他会没事的。”

几分钟之后，吴先生回来了，脸还有点红，但显然已经没事了。他没理会我们关切的询问，而是大口吃起盘子中的猪肺。半个小时后，我们吃不下了，胡里奥按照计划溜出去“上厕所”，然后暗地里跑到收款台，小声索要账单。“埋单？”收银的女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你一起吃饭的那个老人家在半个小时前已经付过了。”

老谋深算的吴先生再次把我们打败了，除了品味留在这个国家的败绩，我们无能为力了。

二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对于未来，我们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我来到中国五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个从 2007 年秋季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进修机会。我决定接受。胡里奥在中国生活了近六年之后，开始有了离开的冲动。尽管仍在中国，但我们和这里在心灵上已经拉开了距离，我们想要尝试新的冒险。

自从 2002 年 8 月来到北京，身边已经物是人非。我的许多朋友——那些记者和外交官结束了为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后，已经离去。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那些学生也已都毕业，有几个正在国外学习。

奥运会即将举办，我刚到北京时四处可见的“拆”字几乎踪迹全无，因为那些房子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拆了。前门旁化为灰烬的胡同中，一座漂亮的购物中心初具规模。

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出租车已经涨过两次价。清除中式英语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他们已经把我特喜欢吃的一种鱼的翻译从“大便”（crap）改成了虽不是那么具有娱乐效果，却更为精确的“鲤鱼”（carp）。而最受外国人青睐的城市地标——东大肛肠医院巨大的霓虹灯招牌上醒目的英文“Dongda 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现已改成了文雅的“Dongda Hospital of Proctology” 。

在一个国家呆五年不算长也不算短，而且我没有虚度这段时光——四处旅行，不停提问。但当我在中国的生活即将拉上帷幕，越来越多的人却会向我问一些问题。



当我离开中国去欧美旅行的时候，人们会问："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将经历剧变，还是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势力？不进行基本制度的变革，中国是否会陷入动荡？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在印度，大家关注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无论报纸编辑还是家里的仆人，他们最常问到的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印度能从中国那里学到什么？或者说，印度应该做哪些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国把美国视为评估自己的国力和成就时的终极标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评价自身进步时常用的参照系。

回到中国，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经常问我："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与娄亚 （音译）和我家附近公厕的保洁员聊过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的女佣；我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

在我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样一个简单物件——起到保护作用的覆盖物、细菌和皮肤之间的阻碍物——至少让他们得到了一点点自尊。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的读写能力足以避免最恶劣的盘剥。

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处，而且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种不算大的进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数百万保洁员、清扫工、门卫或者掏粪工中的一员，我恐怕更愿意通过命运的轮回投胎成为中国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里，我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当我为了报道写作中所涉及的某个问题，而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国家的智库、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中寻找中文出处的时候，就属于这样的日子。这永远是一项让人垂头丧气的艰苦工作。

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那些年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狡黠、市侩和聪明。正如浙江的企业家所证明的，普通中国人在钻空子、找退路、行贿赂、避开僵硬的规章制度方面，堪称大师。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把隐形眼镜卖给盲人妇女，把鸡爪子卖给素食主义者。

一方面这个国家可能拥有大量成功的推销员以及有闯劲的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评、鼓励集体思维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令人反感的一个方面。而缺乏对思想的热



爱，缺乏争辩本身所带来的快乐，缺乏虽刺耳却不无理性的异议，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

在中国，那些不认同主流的、官方的观点的人，往往被打上了异议者的烙印，并因此受到怀疑、驱逐和威胁。

所以，一个在记者面前说错话的教授可能会突然遭到降级处分，一个太过热衷于腐败调查的编辑有可能会遭到解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只是想尽其所能帮助委托人的律师，如果接了不该接的案子，有可能会把自己送进监狱。

在大学里，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已经烙在学生的脑子里。尽管实践中你也会察觉到或者会利用那种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纯粹的理性层面却并没有给它们留下多大的空间。

身为一个好辩的印度人（那是一个视异见为常态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被强加的、整齐划一的思想和态度，是违背我本性的。因此，尽管印度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某些时候我会坚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印度人，也不愿意忍受中国精神生活的压抑、单调。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呆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

但在同一天，稍后我打开电视，看见印度国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尽管内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双习惯了中国的眼睛看来，却比平日好看。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样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后殖民国家中之所以近乎独一无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在一个因一种理念而非地理、语言或者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里，这种制度得来不易。这种理念甚至赞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仅可以，而且欢迎同时拥有多种或者一种身份。

因此，我是一个德里人，也是一个说英语的人，一半婆罗门人血统一半泰米尔人血统，受的是印度教的熏陶，一个后天选择的无神论者，一个天生的穆斯林。但把这些多样性串在一起的，是最强有力又最难以归类的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印度人。

所以说，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它发展出调节机制，可以处理大范围的多样性以及频繁、活跃的争执必然导致的结果。构成这种机制之基础的指导性共识，或许也是唯一的共识，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你并不需要一定得赞成——除了表达不赞成态度的程序以外。



对于“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是愿意生来就当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所有这些事实仍然无法帮我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与中国学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不同，我总是被鼓励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当年我在德里念哲学的时候，穿着印度土布做的无领长袖衬衫、为人真诚的桑卡兰教授总在课堂上大声强调：“永远不要盲从。”

如果我必须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那我会这么说：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会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通过必要的私人渠道弥补了公共产品的匮乏之后，在印度你就可以随意享受讨论“印度理想”的本质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快乐，或者享受赢得一场精彩的辩论所带来的肾上腺素上升所带来的兴奋感。

印度存在着真正的乐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这些乐趣和自由的并不仅仅是精英。论辩传统构成了印度世俗和民主政体的基础，涵盖社会所有阶层。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贫寒，我就愿意在中国碰碰运气，那里虽然没有民主选举，但与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最关键的是，中国给我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相对要大。换句话说，如果出身贫困，我悲惨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三

我并不是在否认民主选举对于印度穷人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涉的能力。比如为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迫使大量民众搬迁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印度政府那里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务。

其实在印度，投票权并非必然或者常常产生更好的政府，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害怕失去票仓，地方政客对迁徙人口非法侵占城市土地视而不见。由此出现的贫民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例如下水道或供水系统。

在印度，公民以可预料的周期撵走政府。在这个国家，占据多数的大量贫困民众通常能让五分之四的现任官员下课，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选举中，所谓的不信任票因素恐怕都是起到决定作用的。这种状态往往被视作印度民主制度健全的一个著名标志，其实它所反映出的是政府的为政记录。但这份记录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区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贫困减少了，民众还是认为这与政府无关。



所以从根本上看，虽然印度有穷人的政治代表而中国的穷人缺乏政治参与，但中国在基本公共设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电力、排水和供水系统，以及真正有老师的学校，是赢过了印度。

这种异于直觉的状况与这样一个现实有关：在中国，政府通过经济的增长来获得合法性；但在印度，一个政党统治的合法不过是因为它是民选的。因此，实现许诺不如赢得选举来得重要。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许多方面都使得印度历届政府无需一定要履行其许诺。但中国领导者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种奢侈。因此，中国政府对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会比正常反应更为敏感，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依据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分为“平稳假定”——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以及“巨变假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有政体的悖论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崩溃。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中国充满各种矛盾。社会和经济自由与政治掌控之间存在着摩擦，城市中产阶层充满矛盾的需求和抱负，与农民和民工的存在着碰撞。从建筑到宗教，古老的传统、强加的现代性以及复兴的传统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现象四处易见。从瑜伽老师到酒店门童，对于一群群来此淘金的外国人来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机遇之地；但同时，中国又有数亿的贫困人口随时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机会离开故乡。新中国充满了对立，混乱和控制、变革和延续、财富和贫穷、善良与邪恶以一种有可能引发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国政府（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依经验行事，调和各种矛盾的技巧之娴熟，令人吃惊。他们或许一直在走钢丝，但中国人的杂技技巧可是声名在外的。因此在我看来，崩溃或者民主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来数年内，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延续其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策略，同时伴以小幅度的政治变革。

其实我生活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时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中国政府的行动迟缓或者僵化，而是它对实用主义的信奉，以及愿意尝试新想法的愿望。与印度的那些共产主义政党对于任何实质上的创新之举（从经济特区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现出的陈腐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相比，中国的做法尤其令人引人注目。

从农村的合作医疗计划到提议废除户籍制度，中国政府喜欢通过实验来充分检验各种改革措施。当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将巩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维持现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北京运用了一系列方法。

他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经济的增长。



城市的中产阶级从这种增长中直接受益最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经验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恰好也是这些人。通过把这个群体的繁荣与共产党继续掌握政策的制定权捆绑在一起，中共已经有效地从政治上解决了有可能成为其最大敌人的一群人。

与此类似，其他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收入差异、腐败和环境问题，也引起了重视。事实证明北京对于各种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就像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共忙着扑灭的大火许多都是它自己导致的，是基本管理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但你也可以说，哪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领导层的确在尝试进行医治，不过要注意的是，他们找的是中医而不是西医。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弗洛拉的学生要请几天假。她说，妈妈病得很严重。我早就听说她妈妈住在加拿大，所以问她是不是要飞过去看妈妈。“哦，不是，”弗洛拉回答说。“在加拿大治不好，她准备飞回北京看中医。”

回到政治改革的问题，中国的领导层不仅认为这种改革是可行的，而且已在进行中。不过这场改革的节奏和条件依据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非依葫芦画瓢模仿西方的自由多党模式。简而言之，北京认为中国人的病还是得用中医治。

西方仍怀疑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之处，但中国曾经一再地令西方大跌眼镜。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基础是法制建设。它不是搞多党民主制，而是在一党制的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制衡机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据专横的、官僚的指令。

所以，人民获得的不是投票权，而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包括就某些问题起诉政府机关的权力，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宗教自由等等。尽管法律仍然被视为一个控制工具，但它同时也被视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并且个人权力的保障也得到了加强。

随之而来的是法律意识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中国人所说的维权运动势头渐猛，尤其是 2003 年孙志刚死亡事件之后。几年来，维权运动取得了几次成功，迫使政府撤销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举措，唤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些维权人士的工作重心不在政权的更替上。他们的目标不是推翻政权，而是督促其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们打抱不平，反对地方官员滥用职权，这使得中央政府往往站在他们一边。引发维权运动的常见原因包括地方上非法侵占土地所引发的冲突、城市发展以及环境污染等。

互联网和手机这些新技术对于维权运动的影响力大小发挥了核心作用。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 2003 年宝马撞人案，和 2007 年厦门 PX 化工厂事件。从曝光官员在煤矿事故中的过失到救下差点被送上餐桌的猫，互联网提供了公民社会兴起的聚焦点——尽管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对此进行控制。



不过，不同于过去一味的打压，政府在策略和目标方面，已经能够更好地处理新技术进入政府和公民互动关系后所带来的复杂性。在政府看来，互联网既是威胁又是机遇。一方面，网络可以避开进而打破权力对信息的垄断；另一方面，公众在互联网上表达舆论也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反馈机制，一个测试国民的看法和情绪的手段。

中共进行政改的双轨方式就是把更大规模的参与和持续性的压制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高风险、存在潜在危险的策略。它不仅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有可能引火上身。如果激起了公众对于改革的期望，但中共又无法或者不能满足这些期待，爆发严重的摩擦是相当有可能的事情。由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修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社会赖以构建的体系难以稳定。因此，中共被迫进入一个半永久性的危机-反应模式。

不过，北京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把压力保持在文火炖而非翻滚沸腾的状态。尽管透过水晶球占卜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我还是愿意肯定地表示：在一段时间里，中共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文火状态，避免爆炸的发生。

在我抛出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时，你可能会问我许多人已经问过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些年的历史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印度有什么借鉴意义？

过去几年中，印度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经验”以及中国能从印度学到什么，成了国际会议上的时髦话题。那些兴奋的记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师、跃跃欲试的商人以及圆滑的政客，一谈起中国都是金句不断，但说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没什么意义。

其中的一条“深刻见解”是，印度擅长做软件，中国擅长搞硬件。另一条是，印度应该仿效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应该借鉴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总之，结论看来就是印度应该修路，中国应该建立民主制度。

这些观点具有一种精致的对称性，它们发现中国和印度其实像镜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与败。但两国的评论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轻易看出，如果中国有了印度的政体，或许就没有这么多马路。

事实上，民主在印度经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进行辩护的借口，正如中国把印度的民主制度作为必须坚持一党专政才能获得（相对）高效的借口一样。在中国，印度总是作为民主缺陷的样本；同时在印度，那些羡慕中国经济成就的人也会哀叹，如果以民主为代价，印度也能取得中国的成就。

但这正是让我觉得争论出了偏差的原因。民主强调建立共识，或许它在印度延缓了决策过程，但同时，它所维护的制度基础应该使得一个国家的治理更为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印度的政党能够从北京的技术官僚身上学到的，就是不要只盯着选举结果，而要把经济增长和提供公共设施作为最终目标，至少作为第二个目标。指望印度的政客们能够大公无

私、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想法太天真，但这恰是从中共那里所能提炼出的最珍贵的经验。

应该是印度向世界证明公路和民主可以并存的时候了——哪怕是在发展中国家。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了评论家认为在低收入国家实现民主会不可避免地阻碍经济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但遗憾的是，印度的这种新增长相当程度上并非因为政府。引发全球关注印度经济的，是那些私营部门。类似 IT 这样的行业把印度放在了国际版图上，这些行业一开始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视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够提升在完善基础公共设施方面的表现，比如教育、公共卫生、饮用水以及电力等方面，他们就不仅能创造出一个真正促进经济腾飞的平台，而且这种发展将是可持续性的、有着坚实基础的。

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主要优势在于，其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文化水平、平均寿命、妇女权利以及对待劳动的态度方面，都优于印度。30 年后，尽管中国在后改革时代社会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缓，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这些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仍然有着很大差距。印度要“赶上”中国，仅仅修建基础设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够的。只要有半数的印度女性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吹嘘印度即将“赶上”中国（正如印度一些人惯于这么做的）不过是在说胡话而已。

四

当我坐在四合院里写下这些话时，心中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时间好像在同时加速和放慢。我看看外面，“豆腐”正在悄悄地靠近停在竹丛上的一只蜻蜓。与竹丛成对角线的位置有一棵石榴树，树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粒果实。年初的时候树上长虫，所有的石榴都没有了，但它活了下来，希望来年成熟的果实能再次挂满枝头。

我听见李阿姨正在厨房大声地打着电话，不知道在教谁做三角包。我感到惊讶，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妇女，在北京掌握了印度料理的秘密。“多放辣椒，”她大声喊到。“喂？听得见吗？好了！多放辣椒，印度人喜欢吃辣的，”她继续说道。

她的做菜指示被同样大声的“晚报，晚报”声所打断，一个卖报纸的小贩骑着车从门外经过，加入到胡同生活的大合唱中。我感到一阵忧伤，因为这一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我又感到高兴，因为我经历过那一刻。

我再一次把目光落在明亮的电脑屏幕上，突然意识到引发我写下这一大堆文字的那三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用在无需宏大叙事的事情上——也就是那些貌似平淡，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



中国和印度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而且世界也能从这两个国家身上学到很多。但我从过去五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中又学到了什么呢？

脑海中涌入了许多琐碎的事情。但我所学到的，往往很难用语言进行归纳。确切地说它们融入在那些姿势、表情或者味道中：吴女士微笑时眼里流露出的一丝悲伤；老太太把裹过的小脚从身上放下来时的样子；麦当劳番茄酱甜丝丝的味道混杂着臭豆腐的味道……

总之，在中国这几年的经历教会了我对立的东西也可以共存。这话与政治无关，也不是说矛盾必须得解决，我更多是在说吴先生。我们曾经拿这位房东一点办法都没有——从一大早跑来打扫院子的卫生，到不久前用青蛙内脏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一些玩意儿“毒害”我们。

然而，吴先生是个好人。他热情地修好了堵住的厕所，更换了烧坏的灯泡，修好了厨房漏水的地方。他甚至勉强认同我挑选的芒果黄涂在院子里“也不是那么难看”，最后他还慢慢同意了早上九点之前不会不请自到。

简而言之，当我想到要离开北京时，脑海中出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位六十岁的退休铁路官员，骑着一辆嘎嘎吱吱的自行车——这幅画面总能让我哽咽。

我还学到哪怕是来到最陌生的地方，你也会爱上它。回头看刚来北京的那几个月，当时一想到别人要用像狗吠般的语言跟我说话，就害怕。想到我曾经那样看中国人，让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他们的食物和深不可测的表情曾经让我害怕。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看来变得温和？是在邻居闲聊时的普通话听起来不仅不再刺耳，而且成为了我后来所珍惜的一种令生活宽心的背景声时吗？

后来我知道了，不去了解就盲目厌恶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哪怕是一些表面上看来陌生、让人害怕的东西，亲近感的获得也会比你想得容易。转个弯你就能找到它。

最后一点，我重新学到了大学时代哲学教授们说过的话：匆忙得出的结论以及人云亦云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真相总是难以触及，而且真相很少只有一个。

这些年里，许多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对我所经历的事情进行妖魔化或者颂扬美化。但随后，我又会突然不敢确定之前所得结论的道德基础。我意识到恰如桑卡兰教授说过的：我很擅长“质疑”，却不擅长得出肯定性的结论。或许这是一件好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它或许不是。

（本文受权转载自《单向街 00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 月）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Co-China周刊

姚 洋：印度随想（节选）

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

人民运动是一个地道的草根组织。像这样的组织，印度非常多，它们发挥着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正是印度给中国的一大启示。我们曾经有过发达的民间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族，在城市是街坊和同业公会。计划经济时代把这些中间组织剪除了，把全社会直接纳入到国家的管辖之下，社会因此失去了很多生机。

”

■经济镜像

编者按：受美国一个中、印研究项目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印度贫民窟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们的一个阴谋，原因在于，贫民窟是他们的一个大票仓。政府的无为给政客们留下了掏空国家的机会，给黑社会留下了压榨百姓的空间；但是，民主的好处在于，它也给民众留下了自己组织起来反抗政客和黑社会的权利



与海滨高级住宅为邻的贫民窟

人民运动

通常认为，民主能让政府更加对老百姓负责。但是，要实现这一点，不是没有条件的。此次印度之行让我深信，民主制度下民众监督政府的条件之一是社会平等。就总体而言，印度民主能够反映民众的愿望。比如，英迪拉·甘地擅自实行紧急状态法，希望以此建立她个人的权威，但事与愿违，在大选中输掉了选举，并让国大党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最近印度人民党的选举失利也说明民主反映民众的意愿。

但是，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上的人群，民主并没有兑现其诺言。这些人群就是为数众多的低种姓（印度仅贱民就有二亿多）和居住在各个城市贫民窟里的人们。此次印度之行，我们参观了老德里的旧街道、新德里郊区的半贫民窟以及孟买市区内的贫民窟，对这些地方的生活状态有了感同身受的认识。

印度主要城市都有贫民窟，孟买的贫民窟最多，全市１２００万人口中，６０％居住在贫民窟里。位于市区中部的达拉维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人均面积只有１．８平方米，这其中不仅包括房屋面积，而且还包括道路和其他公共用地的面积，拥挤程度难以置信。我们去参观时，先是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然后在一小片空地上居然发现了一座烧制陶罐的土窑！土窑周围是密密匝匝的茅棚，一旦失火，损失难以想象。两个妇女和一个男人在用最

原始的方法制作陶坯，就仿佛现代技术从未降临印度一样。其中一位中年妇女告诉我们，她就出生在土窑边上的一间茅棚里。看来，达拉维存在已经有好些年头了。



（达拉维贫民窟的制陶人家）

达拉维的地理位置很好，不远处就是孟买机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达拉维是这两处地方进城的障碍。因此，孟买市政府早就通过立法，要对这个贫民窟进行改造，办法是为居住在这里的人每家提供一间２０平方米大的房子。我们去参观了一处这样的房子。这座房子还不是政府出资的，政府只给了土地，建筑费用来自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捐款。这是一座楼房，内部结构类似中国的筒子楼，只是每间带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每间面积约２０平方米，说是住一家人，但往往要挤上两到三家人，也就是说，每间要供８到１２口人居住。为什么会挤入这么多人呢？原因之一是物业费太高，一家人负担不起。

印度人家的一个好习惯是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哪怕是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家也是如此。但是，屋子之外就是另一个天地了。多数街道没有铺水泥，即使铺了，也是坑洼不平的。主要街道上正开膛破肚修下水道，看样子已经开工许多日子了，但完工似乎仍然遥遥无期，污水肆意地冒出来，形成断断续续的一条臭水沟。我们访问的时候是旱季，苍蝇、蚊子还在肆虐；难以想象，当雨季来临的时候，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敢肯定，任何到过达拉维的人，都会惊讶人的忍耐力；这里不应该是人居住的地方，它连牲畜聚集地都不如！在中国中西部农村，我也看到过环境卫生极差的村子。但是，农村的好处是可以利用自然的

净化能力消化掉大多数生物污染，而达拉维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自然早已不复存在了。

贫民窟是如何形成的呢？以前，我以为贫民窟居住的都是不名分文的穷人，他们是因为没有钱才住进贫民窟的。这次印度之行让我了解到，贫民窟里住的不都是赤贫人口。比如，孟买贫民窟的人口中只有４％属于印度的法定贫困人口，而住在达拉维的一些人实际上在半岛南部的写字楼里上班。

孟买贫民窟的人口近几年增长迅速，和孟买高速的经济增长有关。实际上，贫民窟人口增长快的城市，都是经济增长快的地方，班加罗尔也一样。住在贫民窟里虽然不舒服，但留在农村生活更无着落。移民们到了城市，找到一份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却没有住的地方，就只好流落到贫民窟里。印度学者在正式场合把贫民窟叫做“非正式聚集地”，这是比较贴切的叫法。

贫民窟形成之初都是从非法占用公共或者私人土地开始的。比如，孟买世贸大厦旁边的一片贫民窟，显然是当初参与大厦建设的工人居住的地方。印度的建筑商不给工人提供住房，工人又往往拖家带口，只能在工地附近搭上临时窝棚度日，时间一长，就形成贫民窟。孟买的贫民窟分布很广，最差的是那些“人行道贫民窟”，它们就着围墙搭建在人行道上，没水、没电、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实际上，２８％的贫民窟居民，即约２４０万人没有任何卫生设施，排泄只能在露天解决。

既然是非法占用公共或私人土地，为什么政府不强行把贫民窟里的人赶走呢？政府的确这么做过，现在也在做，但收效甚微。原因之一是黑社会的存在。黑帮分子有意在公共土地上修建临时窝棚，出租给外来移民住，收取他们的房租。有些时候，房租可以免掉，只要他们占住土地就行了，因为占有时间长了，到政府下决心改造时就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费。这些钱本应给居住在那里的移民，但自然是归了黑帮分子的腰包。政府来摧毁一次，他们马上又来建新的，一二百卢比就够了。但是，黑帮还不是贫民窟无法铲除的根本原因，像达拉维这样大面积的几乎永久性的贫民窟，其形成和政府糟糕的法律以及政客们的野心分不开。

在印度宪法里，保障人的迁徙权和居住权具有比保障公、私财产更高的地位。实际上，自英迪拉·甘地在１９７０年代末修改宪法之后，“保障私有财产”这一项就已经被从宪法中删掉了。中、印的对比，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和无数人的呼吁，中国宪法里终于有了保护私人财产这一条（尽管还留了一条私人财产必须“合法”的小尾巴），而印度却走了相反的道路，把这一条从宪法中删除了。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印度则由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

当我和印度朋友谈到贫民窟改造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都如出一辙，认为保护贫民窟居民的居住权优先于保障公共和私人的土地所有权，而且，他们都对政府的强行拆迁表示极大的

义愤。的确，政府在拆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的确让人气愤。在中国，钉子户对付拆迁的最有效办法是赖在房子里不走；在印度却常有拆迁过程中把留在房子里的人铲死的新闻见诸报端。更为重要的是，拆迁之后，贫民窟里的许多居民就会失去生计。贫民窟里的环境虽然极差，但离开了贫民窟，许多人就无法生存。

印度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规就业支撑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要建成世界的办公室。这种说法如果不是痴人说梦，就是自我粉饰。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发达第三产业的阶段。印度的软肋恰恰是制造业不甚发达，大量劳动力因此不得不集中在低端服务业里，不仅收入低，而且受地域影响大。就业安置是妨碍贫民窟重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孟买，政府的房租控制法是造成贫民窟蔓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孟买涌入了大量移民。英殖民政府为保障这些人有房子住，通过了房租控制法，把房租压在较低的价位上。当时的设想是，这个法案是临时性的，几年之后应该废止。但是，那些在这个法案里受益的人不会甘心法案被废止，他们的强大游说活动让这个法案保持至今。不仅如此，法案的条款还得到加强，其中一条近乎荒唐的是，一旦房客在一处住房住满一年，则他就有优先权购买这处住房；即使不购买，他只要交房租，就可以无限期地住下去。这条法案导致的一个滑稽后果是，每年十月孟买都会出现一支支浩浩荡荡的搬家队伍，原因是，房主为了避免房客在一处住房住满一年，宁肯在别的地方建临时房子，把房客搬过去住两个月。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私人出租房屋的积极性没有了，更不愿意新建出租房屋。孟买已经十五年没有建设新的出租房；更为可悲的是，当７００多万人挤在恶劣的贫民窟里时，孟买有４０万套住房是空置的！以每套住房居住五口人计算，则这些空置住房就可以解决２００多万人的居住问题。孟买政府的雄心是为贫民窟的每户人家提供２０平方米的住房，但现在的建设速度尚赶不上贫民窟人口的增长速度。

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都要把印度建成不同于苏联和中国的第三种社会主义。这个梦想如今不怎么提倡了，但政府对经济的肆意干预仍然十分常见，房租控制法就是一例。以印度反观中国，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市场化的程度有多深。中国残存的政府干预是出于政府之手，体现的是官员们的意志。在印度，政府干预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不是政府的自为之举。中国的长官意志要不得，但印度的民主意志也不总导致合意的结果。民主政治的一个潜在危险是政府的公地化，即政府成了各种利益集团自我耕耘的场所，而社会的整体利益被抛在了脑后。

政府的公地化给政客提供了可乘之机，让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挟民众之意，获一己之利。贫民窟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们的一个阴谋，原因在于，贫民窟是他们的一个大票仓。孟买的中产阶级早已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许多人选择远离政治，不参加投票，因



此，政客们把目光集中在贫民身上。贫民窟里有无穷无尽的需求，供水、供电、学校、厕所、下水道，等等，都等待政府来解决，政客们许诺的少许恩惠就足以赢得一部分选票。印度的水、电供应非常分散，是按户来进行的。这种分散的供应方式，非常有利于政客们拉票，也有利于他们对选民进行各个击破。贫民窟的选票来得容易，还因为黑帮的流行。印度多数政党、特别是地方性政党都是黑白两道通吃。在贫民窟，黑道控制着日常生活，因此，只要控制黑帮，选票就有着落了。

政府的无为给政客们留下了掏空国家的机会，给黑社会留下了压榨百姓的空间；但是，民主的好处在于，它也给民众留下了自己组织起来反抗政客和黑社会的权利。我们在新德里郊区的半贫民窟地区访问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管中窥豹，对印度市民社会的深度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

这个非政府组织叫“人民运动”。印度有许多叫人民运动的非政府组织，我们访问的是其中一个较小的。我们中、印一行学者共十几个人，先是坐地铁，然后坐摩的，又花了很长时间在人、车、牛混杂的街道寻找，傍晚时分才找到它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小，分成里外两间，布置得和普通人家一样整洁。我们和人民运动的四五名积极分子座谈。他们都说不好英语，我们必须借助印度学者的翻译和他们交流。

人民运动的创办者阿文德·柯内瓦尔（Arvind Kejriwal）是一位看上去略有文化的精干年轻人，其他到会的人更年轻，其中一位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的姑娘。

人民运动创办的起因是这一地区的许多穷人买不到政府的低价粮食。为了解决极端贫困者的食物供应问题，印度政府每年补贴十几亿美元，给他们发放食物券，凭食物券提供低价粮食。低价粮不是政府直接发给贫困者的，而是先发给社区的商店，贫困者拿着食物券到商店购买。这就给了商店老板们可乘之机。当穷人来购买低价粮的时候，他们要么说穷人没有在政府资助的名单上，要么说政府没有下拨低价粮。多数穷人听店老板这么一说，都自认倒霉，只好付市场价格买回粮食，店老板因此挣得可观的赢余。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印度穷人这样逆来顺受的态度简直不可思议，换了在中国，至少一部分人会闹到政府去找个说法的。印度学者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穷人来说，受苦受难是他们自认的命运，政府的救助是对他们的恩惠；恩人不施恩了，也是正常的事情。

人民运动的几位积极分子决心为穷人讨回公道。他们所使用的武器是新近通过的信息法。这个法规定，任何人都有权查阅政府的所有不涉及国家机密的记录。利用这个法，他们到区政府查到社区里所有注册领取食物补贴者的名单，然后拿着名单到商店去对质。这让商店对他们恨之入骨，店老板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有一次，他们抓住了阿文德，把他痛打一顿。他夺路逃进警察局，店主还在门外大喊，要警察把他交出来烧死。那位小姑娘也曾经被人从后面勒过脖子，差点儿丧命。最后，是媒体帮助人民运动取得了胜利。通过报纸



和电视的宣传，德里地区的民众给了人民运动极大的支持，店主们终于答应他们的要求，开始卖给穷人足额的低价粮食。

人民运动是一个地道的草根组织。像这样的组织，印度非常多，它们发挥着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正是印度给中国的一大启示。我们曾经有过发达的民间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族，在城市是街坊和同业公会。计划经济时代把这些中间组织剪除了，把全社会直接纳入到国家的管辖之下，社会因此失去了很多生机。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开始休养生息，一些自发的民间组织开始重建或新生。但是，相比于印度，我们的民间社会仍然不够深厚。印度深厚的市民社会得益于民主所给予的宽松环境。既然我们和印度一样，也在经历一场民主化的革命，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从现在开始市民社会的建设。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Co-China周刊

?析?

黄亚生：印度离中国还有多远？

——从经济表现、体制影响、发展现状预测两国前景



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教授

“

从中印两国经济表现看，印度发展潜力比中国低，而且有其无法克服的热带地理位置障碍，但它的增长率却接近中国，因此应给予印度经济发展较高评价。印度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印度的金融改革、私有化等都激活了其经济活力。印度在金融和私有化领域成绩超过中国，一旦印度在人力资本上接近中国，那就会是印度经济真正起飞的时代。对中国而言，需要正确看待“铁公鸡”经济学，不能将中国经济成功诉诸国外直接投资和基建投资，而要加强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资。

”

摘要　从中印两国经济表现看，印度发展潜力比中国低，而且有其无法克服的热带地理位置障碍，但它的增长率却接近中国，因此应给予印度经济发展较高评价。印度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印度的金融改革、私有化等都激活了其经济活力。印度在金融和私有化领域成绩超过中国，一旦印度在人力资本上接近中国，那就会是印度



经济真正起飞的时代。对中国而言，需要正确看待“铁公鸡”经济学，不能将中国经济成功诉诸国外直接投资和基建投资，而要加强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资。

中印两国经济表现的比较分析

一般来讲，中印经济作比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比较的方式是简单、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 GDP 和另一个国家的 GDP 作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得出的一般共识肯定是这样的：中国的 GDP 增长快于印度的 GDP 增长，很多人因此简单地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比印度更加成功的。

对这种比较方式，笔者提两个不同的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即使作这种比较，你也会发现中印之间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在明显缩小，在 1980 年代、1990 年代初期，中国的发展速度与印度的发展速度差不多是 2：1，到现在差不多是 1.2：1，可得出的明显的结论是，两国家发展速度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另外，如果考虑到其他因素，比如说，中国每年的 GDP 中有 50%是作为投资的，印度一般来讲是在 35%左右。也就是说，印度的投资率相当于中国的 70%，而印度的增长率现在已经达到或者是接近中国的 80%，这样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引申出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是因为投入了很多的资源，才能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而相对来讲，印度的增长是由效率的提升产生的。 比如，印度能源的使用和 GDP 的产出比率接近日本的水平。

第二种比较中印经济发展的方式是一种更准确的方式，它要根据两个国家发展的潜力来衡量它们的实际经济表现。但是，我们没有发展潜力这样一个指标，所以我们只能提供一些间接的数据来支持观点。有一个可以说明两国经济发展潜力的因素，那就是两个国家在非常不利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环境下的经济表现。中国在 1960 年代、1970 年代遭受了中国政府都承认的十年动乱。在这十年期间，中国的 GDP 的增长也达到了 3%左右。中国在面对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体制上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或者是和印度持平，或者超过印度。这说明中国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外，有优于印度的发展要素。也就是说，中国的潜在增长能力是高于印度的，而且有可能远远高于印度。

为什么笔者认为印度潜在增长力低于中国？有些人认为是由印度民主体制的原因导致的。这种观点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笔者在下文会回到这个议题。印度非常大的一个发展障碍就是它的地理位置，而这个障碍是计划经济体制抑或市场经济都无法改变的。印度是一个热带国家，如果从全世界视角看，二战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在温带或者亚热带，而新加坡是个例外。其他的热带国家和地区，比如说海地、非洲，经济都没有成功。有经济学研究表明“地理决定命运”。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结论，但“地理决定命运”的真实的含义在于，如果你处于一个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那么你就必须在其他方面做

得非常出色经济才能实现发展（比如在教育、技术、政治和经济制度等方面）。反之，如果你处于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那么对经济发展的其他条件要求就可以相对降低。所以，我们在分析印度的经济表现时必须要考虑它面对的外在的、无法用政策体制克服的地理障碍。今天，印度的 GDP 增长能达到 5%～7%，甚至有几年达到 8%～10%，这个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从发展潜力上，衡量这两个国家，我们认为：印度的发展潜力比中国低，但是它现在的实际增长率已经在接近中国；同时，尽管中国的发展潜力高于印度，但中国实际发展速度却接近印度。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客观的分析者应该给印度一个较高的评价。

体制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印度之所以能够部分克服它的困难而实现发展，主要依赖于其体制的发展。这是本文的第二个议题。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并经常拿印度作例子。那么请看下面两个国家：

A 国在 1990 年人均 GDP 是 374 美元，与此同时 B 国是 465 美元。到了 2008 年，A 国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 714 美元，而 B 国是 650 美元（所有引用的数字是以 2000 年的美元为单位）。你可能会说 B 国是印度，A 国是中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以平价购买力调整后的人均 GDP 计算，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中国一直在印度后面。但到了 90 年代初期，中国不仅超过了印度，而且把印度远远甩在身后。威权模式似乎已经赢得了经济竞赛。

事实上，B 国是印度，A 国是巴基斯坦。2007 年，《经济学人》杂志将印度归为世界上 54 个“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之一， 而巴基斯坦则被列为世界上 55 个威权国家之一。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远比许多中国学者和官员所想象的复杂。那些相信威权体制拥有经济发展优势的人经常以东亚奇迹为例证。但是，这个“东亚经济威权”理论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的。持这个观点的人犯了一个很基本的方法论错误。这个错误在统计学里面叫做“遗漏偏差”，即只去看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数据而全然不看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数据。

持“东亚经济威权”论观点的人只去挑选那些经济取得成功的东亚案例，而完全忽略了那些在经济上失败的东亚案例。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方法论问题，因此其结论也必然是荒谬的。每一个东亚威权体制成功的故事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失败故事。台湾变得富裕而独裁的缅甸没有。韩国发展迅猛，而朝鲜仍然停滞不前。新加坡的强人统治成功了，但是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香港也成功了。如果把视野跨越东亚，看一看全球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上，一些民主政权成功，而另一些民主政权失败。对于威权政权也是这样。正如社会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威权政体并不会比民主政体在经济上更成功。

许多中国人都喜欢把印度 GDP 的低增长的原因归咎于其民主制度。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印度的经济增长确实是极为缓慢的，平均增长率只有 3%左右。这被学界称为“印度式增长率”。但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中国经济也没有起飞，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威权式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开始改革之前，印度的经济体制是模仿苏联模式的。“印度式增长率”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失败。许多采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比如东德、朝鲜、罗马尼亚，在经济发展上都失败了，而且它们没有一个是民主政体。

与印度历史上的 3%的增长率相比，印度目前年均增长率为 6%至 7%，而且它仍然是一个民主政体。在当下全球性衰退中，在几乎没有实施强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印度保持了高于 6%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出台了也许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较之于中国的 GDP 而言），这种靠大规模政府投资和发放贷款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相比较而言，印度的增长更多的是来源于私营企业的活力，这种发展方式更具有持久性。

当印度进入高增长的年代，印度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而它的经济体制改变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印度开始推行私有化、金融改革、迎接全球化，并且鼓励竞争。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也提升了其增长率。没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民主制度对其经济增长造成伤害。恰恰相反，印度今天的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缺陷，但较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今天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自由、问责性更强、更加透明。很多中国人和西方观察家忽略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印度的低增长年代恰恰是印度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而印度高增长的年代恰恰是印度体制最民主的年代。

印度政治在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完全被英迪拉·甘地夫人和她的家族控制。甘地夫人领导下的印度可以被比作 Fareed Zakaria 所说的“不自由的民主制度”。当时，印度有民主的形式但不具有民主的实质。在 1975 年，甘地夫人取消了民主选举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她以铁腕方式统治着国大党，并多次推迟或者取消了国大党的选举；她也多次废除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实行中央集权。印度宪法第 356 条款授权联邦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可以接管州政府的运作。在 1966 年到 1976 年期间，甘地政府动用宪法第 356 条多达 36 次，在 1980 年到 1984 年，又动用这一权力 13 次。在印度的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恰恰是它的经济表现最差的年代。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印度政府高度管控传媒业。所有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是国有的。随着经济改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印度也开始推行政治改革，开放新闻报道和推行传媒业的全面私有化。现在，印度的电视台都是私营的，它的互联网也是不受管制的。在过去的 20 年里，印度的独立媒体揭发了多起印度官员腐败的案例，形成了制约政府的一股重要力量。这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印度所有的政治改革的措施都是在它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印度最早通过“知情权法案”是在泰米尔纳德邦（1997 年）和果阿邦（1997 年），而其他几个邦是在 2000 年通过类此法案。“知情权法案”要求政府和由政府资助的组织给予人民更多的知情权，政府和政府部门必须有专门机构负责向公民披露政府所掌控的信息。2005 年，印度国会通过了全国性的“知情权法案”。在印度，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都是正相关的关系。中国很多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阻碍了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多年来，印度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少数城市精英垄断了政府决策过程。这是由印度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封建制度统治的原因所导致的。民主制度现在也被引入印度农村地区。这个进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1992 年，印度通过修改宪法和推广乡村自治的方式推进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长老会”，即由五位高级种姓的村社长者组成一个乡村自治性质的治理机构。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将极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质量，帮助印度克服腐败。

体制的第二个问题是金融体系。笔者在 2008 年发文提出，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比印度早十几年，但是印度的金融改革是领先于中国的，当时很多人士表示不赞同这种看法，比如说在麦肯锡作的一个题为“印度的金融体制应该向中国的金融体制学习”的报告，到今天至少从学界来讲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印度的金融体制比中国的更有效率。

从权威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数据库中，我们获得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证据，来评估中印两国的本土私有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环境。WBES 中第 38 个问题就提到，“针对你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来说，融资限制能造成多大的障碍？”被调查企业选择的答案有：没有阻碍、阻碍很小、有一定阻碍和阻碍很大。相对于印度的本土私有企业来说，中国的本土私有企业受到融资限制的阻碍程度更高：80.2%的中国企业选择了“有一定阻碍”或“阻碍很大”，而印度企业的这个两项比重只有 52.1%。就那些回答“阻碍很大”的企业而言，中印两国企业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中国企业为 66.3%，印度企业仅为 25.5%。笔者曾经对 WBES 的数据进行过统计分析，并在这个过程中对那些有可能影响融资限制的其他因素进行了控制，统计分析的结果和以上所描述的结果完全一致。

中印两国目前存在的金融差异绝非偶然。两国在全面经济改革之初都进行了金融改革。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就开始在农村地区实施金融改革，但却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了大逆转，从此便落后于印度。按照中国的速度标准，印度金融改革速度可谓风驰电擎。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前 5 年，印度把金融改革的重点放在减少政府在银行的所有权权益比例上。1995 年～1998 年，印度几大国有银行都相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例如印度银行、巴罗达银行（Bank of Baroda）、印度工业发展银行等，政府股份也因此削减到 50%～60%左右。而在中国，类似的改革在 2005 年之后才开始，而且金融界所有权多元化的改革规模极



其有限。早在 1992 年，印度就已经准许私有银行进入银行系统。截至 2003 年，这些私有银行的信贷额占整个印度银行系统信贷总额的 12%。相比之下，正如伯克利学者 Sáez 指出的，“在中国，私有银行是微不足道的”。

印度的国内产业保护政策常遭人诟病，但在金融系统，印度向国外竞争者敞开大门的时间远早于中国。1998 年，印度政府允许国外投资者拥有本国银行 40%的股份，这个比例是之前的两倍。但目前中国允许本国银行中的外资股份仍限定在 20%。截至 2003 年，外资银行占到了印度本国银行资产的 8%，而在 2002 年底，外资银行却只占到中国本国银行总资产的 1.7%。花旗银行在中印两国的情况就很好地说明了它们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截至 2000 年，花旗银行在印度的总资产达到了 358 亿美元，而在中国却仅为 25 亿美元。同年，所有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资产总额为 340 亿美元，仅相当于印度一家外资银行（即花旗银行）所拥有的资产额。

另一个显著的差异是股票市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印度的股票市场对本土私有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作用，一些最具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都将其发展归功于在孟买股票交易所的上市。例如，Infosys 公司在 1993 年就发行了股票，这一举动对公司的战略性增长至关重要。Infosys 公司利用上市所融资金，建成了如今声名显赫的“Infosys Campus”，这也使得它从印度许多同行企业中脱颖而出。相比之下，中国本土的私有企业很少有机会在本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一些著名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如联想、华为，都没有在本国上市。

正确看待“铁公鸡”经济学

许多中国学者和官员相信，较之于印度，中国的巨大的优势是其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特别是中国政府快速进行基建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能力。笔者把这个观点叫做“铁公鸡经济学。”

这种“铁公鸡”经济学的观点在 1 0 年前可能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今天，可以说它是最有害的经济学观点之一，因为这种观点从理论上支持了投资膨胀和一系列非常有害的举措（比如强制拆迁等）。投资膨胀正在威胁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与许多其他有害的经济学观点一样，这种观点在事实层面上也是错误的。那种相信中国成功应归功于基建投资和 FDI 的观点，源自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统计数据。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到 20 世纪 80 年代，得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十分具有活力，经人口加权后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 80 年代，中国几乎没有吸引多少 FDI，其中最高额只有 30 亿美元，在当时中国总投资额中可谓微不足道。尽管中印两国的增长率在最近几年已经趋近，但是毫无疑



问，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增长率是远超过印度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表现最强劲的年代恰恰是中国依赖外资最少的年代。

其实，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基础设施是落后于印度的。在 1989 年，印度的公路通车里程是 140 万公里，而中国只有 86.2 万公里，印度的铁路交通也更为发达。在 1975 年，尽管印度面积比中国小，但是其拥有 6 万公里的铁路，中国只有 4.6 万公里。到了 1995 年，中国的铁路仍然比印度的短。一个衡量铁路系统“质量”的指标是电气化铁路的里程数，在这一方面，印度也是超过中国的。1989 年，印度电气化铁路为 5345 公里，中国只有 1700 公里。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在基建上的落后并没有阻碍中国在那十年中取得远远超过印度的增长成绩。

将中国的经济成功归结于 FDI 和基建投资无疑是本末倒置的。对中国经济发展更符合事实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中国有了经济增长，然后因为经济增长才有了后来的 FDI 和基建投资的增长。经济增长是原因，而 FDI 和基建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现在，印度正在复制真实的中国业绩。一旦印度的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一段时间，FDI 就会进入这个国家，尽管它的基建状况还是不尽人意。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资源的过程，它所带来的资源就可以用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印度正在吸引着巨大的 FDI。印度的 FDI 流入值已经从 6 年或 7 年前的 60 亿美元增长到今天的 300 亿美元。尽管没有达到中国的速度，但是印度的基建设施也有很大提高。像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非常明智地进行资本配置。印度政府的投资重点应该是它的基础教育和卫生服务，而不是修建机场和高速公路。只要印度能将增长率保持在 6%到 7%，它就会有足够的资源为机场和高速公路建设进行自我融资。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借助未来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源为代价即高昂的基建融资，要远远比向广大底层公众征税更为有效率和更加公正。

相对于印度来讲，中国真正的优势是教育水平、特别基础教育水平，并不是基础设施的优势。印度现在正在大力加强基础教育投资，力争弥补“不自由“民主期间（1950 至 1980 年代）犯下的忽视基础教育的巨大错误。要赶上中国不容易，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太强大了。但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 GDP 增长不去投资教育和公共卫生而去建楼、修路，将教育和公共卫生需要提供的成本转嫁给中国老百姓。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策。不投资教育，不保证每一位农村的儿童都能上得起学，就等于是在主动放弃中国的竞争优势。

印度很容易被低估。它所取得的很多成绩主要是在看不见的制度领域，比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它主要的不足恰恰又都是在能看得到的硬件基础领域。但是，印度正在加大教育投资，一旦印度在人力资本上接近中国，那就会是印度经济真正起飞的时代。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 年 10 月上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夏业良：辛格的自信与印度模式的底气

经济学家

“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是以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为特征的，比较注重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而“印度模式”则是加速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向传统工业和农业的渗透与反向刺激，侧重面向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大众消费能力提升。两种发展模式孰优孰劣，目前仍无法评判，但“龟兔赛跑”的新寓言开局似乎已呈现在世人面前。

”

无论是在中国知识界还是社会大众中间，谈及对当代印度的全方位了解，大家可能不得不承认：对身边这样一个文化迥异、制度不同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们实在了解得太少太少。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是以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为特征的，比较注重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而“印度模式”则是加速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向传统工业和农业的渗透与反向刺激，侧重面向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大众消费能力提升。两种发展模式孰优孰劣，目前仍无法评判，但“龟兔赛跑”的新寓言开局似乎已呈现在世人面前。

印度总理直言不讳

印度总理辛格 3 月底在出席伦敦 20 国峰会之前，接受了《金融时报》的专访。他比较了中印两国的经济前景，认为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更有可能取得长期胜利，相比之下，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则具有潜在脆弱性。“中国人拥有某些优势；但从长远来看，我更看好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我们的体制行动缓慢，但我相信决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

《金融时报》评论说，印度主要领导人如此直言不讳地公开发表印度与中国对比孰优孰劣的论断非常罕见。事实上，辛格总理的这番话也是针对印度国内企业家和国外投资者责难其民主政治体制实际绩效的公开回应。因为有不少印度工商界人士以及外国投资者都认

为：印度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都明显低于中国，中国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迅速果断的中央决策能力与资源集中与配置能力都让印度企业家敬畏有加。

我们或许会为印度总理这番如此自信而毫不自谦的话而震惊，甚至可能无法接受他对印度经济前景好于中国的自恋式判断。然而我们可能无法拒绝印证或反驳这一论断的欲望，并且可以通过许多已经公布的第三方国际数据，来考察和重新认知这个往往被我们忽略或轻视的邻国。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知识界还是社会大众中间，如果谈及对当代印度的全方位了解，大家可能不得不承认：对身边这样一个文化迥异、制度不同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我们实在了解得太少太少。

"印度模式"的形成与推进

自 1947 年独立到 1991 年实行经济改革，印度经济一直在艰难而缓慢地发展。印度实行的是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并存的混合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政府对经济计划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重视发展国有企业和重工业，限制私有企业，排斥外资。1991 年印度爆发国际收支危机，政府财政赤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8.5%，外汇储备仅有 10 亿美元，只够维持 3 周的进口支付，当时的拉奥政府被迫实施经济改革，推出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为特色的新经济政策，即放松对私有经济发展的限制、加快国有经济改革、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实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末期的 30 年里，长期保持 3.5%的“印度速度”，到 80 年代提升到 5.8%，90 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又将增速提高到 6%。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在过去的四年中，印度经济明显加速，平均增长率超过 8%，使印度成为中国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又一典范。

近年来，纺织、食品、精密仪器、汽车、软件制造、航空和空间、金融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2007 年，印度工业增长占 GDP 比重为 26.4%。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规模比较侧重于软件，软件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绝大部分比例，信息产业的出口主要依靠软件业。软件产业成了印度增长最快、最引人注目的经济部门，被印度人称为“旗舰产业”。

2006 年印度信息产业的增长率为 50%，信息产业的增长在印度 GDP 增长部分中所占比重达到四分之一。2007 年印度信息技术和服务外包收入达到 363 亿美元，比 2006 年增长 28%，占 GDP 的比重也增长到 7%。2008 年印度软件业产值约为 850 亿美元，到 2010 年印度信息产业的产值将接近 1030 亿美元，大约占印度 GDP 比重的 20%。

改革之后，经济状况明显改善，财政赤字逐年下降，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国际收支状况持续好转，外汇储备大大增加，投资环境逐步改善，外商投资逐步增多，国民经济稳步发展。进入 21 世纪，印度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使其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实现了有印度特色的经济增长。



印度的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尽管仍存在相当大的缺陷，但却一直在为本国私营公司的发展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和宽松的投资环境。近几年来，印政府不断深化第二阶段经济改革，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行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部分生活必需品销售自由化，改善投资环境，精简政府机构，削减财政赤字。辛格为印度的民主政治制度辩护，他说，正是民主政治制度使印度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自 1991 年以来，印度经历了 4 到 5 届政府，但没有一个政府敢于逆转我们开启的改革道路”。

2006 年至 2007 年度，印度经济实现 9.6%的高增长。2007 至 2008 年度为应对通胀，印度政府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大幅提高利率，经济增长小幅放缓至 8.7%。预计印度经济在 2009 至 2010 财年的增长率大致介于 6.5-7.2%之间。

2006 年，印度中央和地方全部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约为 17%，而美国和英国的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分别为 27%和 37%，巴西的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也达到 37%。在印度的税收总收入中，中央级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为 11%，邦一级的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为 6%。

知识经济与比较优势

2000 年，当时的总理瓦杰帕伊提出印度要成为“知识大国”的主张，主旨是把握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短缺带来的机遇，使印度未来发展以面向全球的服务型知识经济为主，走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2002 年，印度计划委员会在推出其《十五计划》的同时，发表了《印度 2020 年展望》报告，阐述了印度发展知识经济的基本构想，基本体现了瓦杰帕伊的战略主张。

印度计划委员会认为，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在由资本资源转向知识资源，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知识已经替代了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印度政府预测，下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将出现在服务业上。在未来的 15 年中，发达国家的低人口增长率和老龄化趋势将导致人力资源的大量短缺，这对那些能够提供技能和外包服务的国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知识经济的服务出口方面，印度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拥有一支庞大的运用英语的科技和专业人员队伍。印度高等教育发达，每年大学毕业生有约 310 万人，到 2010 年毕业生人数还要增加一倍；劳动力成本低也具有比较优势。印度从事外包服务的雇员工资只有美国雇员的三分之一甚至十二分之一。在国际软件外包市场，印度因拥有大量劳动力成本低、高素质的 IT 人才而被跨国公司看好，成为全球软件行业大国；印度人口结构呈年轻化趋势。到 2020 年，印度 15 岁至 59 岁的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 35%升至 47%。

印度的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比起其他发展战略，能更有效地为民众谋求福祉。



私有经济的促进与中产阶级的成长

2007 至 2008 财年，印度 GDP 总值已经达到 1.16 万亿美元，并且在 2006 至 2007 年度印度已成为全球第 12 个 GDP 总值超过 1 万亿美元的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印度仅在美国、中国之后，居世界第三。但是，如果以人均 GDP 计算，印度的排名仍相当落后(2007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居世界第 74 位，印度居第 120 位)。

私有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印度模式”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印度在独立之后一直允许私有经济存在，但对其有严格的限制。20 世纪 80 年代，印度政府推行了旨在推动私有经济发展的改革。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得以进一步深化，私有经济的能量充分释放，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如塔塔集团、比拉集团、维普罗软件公司、兰巴克西制药公司等。目前，印度私有企业的产值已占到 GDP 的 75%，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

私有企业的发展同时催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过去 20 多年中，印度中产阶级数量增加 4 倍，仅据 2007 年的统计，印度就有 8000 万个家庭跃升为中产阶级家庭。以一家 5 口计算，印度有中产阶级 3 亿人，即便挤去水分，也不少于 2.5 亿。这一阶层拥有持续稳定增长的购买力，是消费品市场稳定发展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主要推动力。而印度的不平等增加幅度却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印度目前是 0.33，美国为 0.41，而中国是 0.45。

今年 3 月，印度塔塔公司生产的世界最低价格四门小汽车 Nano 正式上市，标准版 Nano 没有安全气囊和防抱死刹车系统，但印度政府没有规定上路车辆必须拥有这两样安全设置。1980 美元是标准版的价格，如需配置空调、收音机和转向助力等要额外收费。加上车购税、公路税、保险等，买一辆 Nano 大约需要 12 万卢比(2376 美元)。另外还有豪华版和华贵版两款选择。由于目前产量有限，顾客必须先支付汽车价格 95%的订金。塔塔公司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提供一种在价格上使大众可以承受的交通工具，并且引领印度新时代的交通方式。

“龙象之争”与“龟兔赛跑”

当然，“印度模式”也有缺憾，印度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相当不平衡。2006 年，印度全民识字率为 67%，贫困率为 27%，全国仍有 3 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预期寿命为 63 岁，出生率 23.5%。，死亡率 7.5%。，新生婴儿死亡率为 57%。。虽然印度政府在反贫困方面进行了长期而持续的努力，时至今日孟买等大城市仍有相当大范围的贫民窟存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 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印度在人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国民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上综合排名第 128 位。



印度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迟缓，不能为数额庞大的农村低技能人口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农村发展落后于中国，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印度社会秩序远不如中国稳定，教派的冲突不时把印度推向战争的边缘。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是以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为特征的，比较注重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而“印度模式”则是加速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向传统工业和农业的渗透与反向刺激，侧重面向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大众消费能力提升。两种发展模式孰优孰劣，目前仍无法评判，但“龟兔赛跑”的新寓言开局似乎已呈现在世人面前。

笔者以为，事先的警醒和未雨绸缪要强于事后的追悔或亡羊补牢。“中国模式”与“印度模式”之争，将可能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经典案例，甚至有可能改写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框架。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Co-China周刊

马加力：龙象共舞：理性看待彼此的成功与无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

中印基本国情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也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别。由于改革起步较晚和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印度和中国在经济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制约印度发展的因素主要有政府决策低效、产业结构差、能源资源紧缺、社会矛盾激化等。在与印度的关系上，我们既需要自信，又需要虚心，还需要合作。龙象共舞，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也将是一个共赢的选择。

”

印度是一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在过去的 20 多年时间里，印度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变化，成为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对于印度的崛起，学界见仁见智，评价迥异。由于印度的基本国情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中印比较自然成为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如何比较准确地把握它的发展脉络，如何理解其增长模式的利弊优劣，如何看待它与中国的差距，以及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外交关系，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进入改革攻坚阶段的印度

印度独立以后，一直实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混合经济模式，采取“管制”和“半管制”的经济体制，公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国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总体而言，经济增长速度相当缓慢。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初的 30 年时间里，年均增长速度缓慢。进入 80 年代以后，印度的增长率有所提高。然而，1991 年出现了国际收支危机，印度被迫实行改革，改革进程由此艰难起步。从改革的进程来看，印度基本上经历了改革启动、改革加速、改革深化和改革攻坚四个阶段。改革的启动阶段一般是指 1991 年至 1998



年这一时间段，改革的加速阶段是指 1998 年至 2004 年这一时间段，改革的深化阶段是指 2004 年至 2009 年这一时间段，改革的攻坚阶段是指 2009 年至今。

改革的启动阶段。1991 年 6 月，拉奥政府宣誓就职不久即相继公布了各种新经济政策。但是，它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家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国际收支出现危机，财政赤字高企，通货膨胀严重。无奈之下，拉奥政府被迫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处方”，采取各种措施缓解迫在眉睫的国际支付危机，甚至不惜将国家储备银行的数十吨黄金运送到国外做贷款抵押，以避免出现更大的经济混乱局面。拉奥总理决定采取压缩进口、鼓励出口、增加关税、削减各种补贴的手段，尽快改善极为紧迫的局面。同时，改变对工业的传统保护机制，引入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放开私营企业的经营领域（除军事工业、原子能工业、危险化学品工业、烈性酒酿制业和烟草工业之外），改善公营企业的经营理念，对“病态企业”实行整顿或关闭措施，并实施部分公营企业的私有化。另外，还取消了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许可证，大幅度降低进口商品关税。在金融领域，放松了从事金融活动的某些限制，允许银行分支机构的关停合并，允许私营部门成立金融机构，允许外资银行建立分支机构，允许外国投资者个人或机构投资债券市场。在汇率方面，决定对卢比实施大幅度贬值，后来又实行经常项目下的卢比可兑换。而且，拉奥政府一再强调改革必须具有“人的面孔”，保护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避免发展对穷人的伤害。

改革的加速阶段。1998 年 3 月，瓦杰帕伊就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开始对农业、公营企业、对外贸易、财政金融进行一系列改革。新政府对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优先发展和大力扶持信息产业，继续进行公营部门企业的改革，大胆推进前几届政府几乎未被重视的农业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瓦杰帕伊政府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和具体可行的产业计划，确定了把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而大力加以促进的路径。同时，还制订了促进电子通讯、生物技术、核能利用和空间技术的优惠政策，为了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政府还实行了加强战略性企业、出让非战略性企业的政策，通过了在 43 家公营企业撤资的方案。另外，政府开始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逐步废除价格管制，减少对小型工业的保护政策，继续深化财政金融改革，增加征税范围、扩大征收群体、调整税收结构，扩大各邦财权，压缩政府开支。在金融体制方面，采取降低银行利率、提高公营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等一系列措施。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继续放宽对进出口的限制，简化进出口手续，取消对所有商品的进口配额限制，对进口实行关税化管理，同时放松对外资进入的限制，放宽印侨对国内公司股票投资的限制，放松对国际收支资本账户的管制，鼓励印度公司对外投资。

改革的深化阶段。2004 年 5 月，由国大党领衔的团结进步联盟在大选中获胜，曾经历任拉奥内阁财政部长和印度储备银行（中央银行）行长、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的经济学家曼莫汉•辛格出任总理。辛格政府在注重维护低收入群体利益和扶持农业发展的同时，继续坚持公营部门的改革，鼓励公营部门的合并，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允许私营部门建

立经济特区和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放宽投资限制，允许卢比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大力鼓励有条件的印资企业在国际舞台实行并购，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为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的攻坚阶段。2009 年 5 月，曼莫汉•辛格再次担任印度总理。为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竭力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应对通胀加剧、财政赤字上升的压力，辛格总理艰难地推动曾经两度流产的“第二代经济改革”。2009 年 7 月，财长普拉纳布•慕克吉表示，印度有必要通过邀请外国超市连锁店、保险公司和工程公司协助印度实现农业、金融服务和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2012 年 11 月，印度议会在巨大的反对声浪中通过决议，允许外商在印度超市投资占股 51%（以前为 24%），在设立直销品牌店时占股 100%。此前不久，印度曾宣布放松外商收购民航、零售、广播和电力贸易行业的股份限制，分别可达 51%、49%和 74%。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印度还决定向私人资本出售印度斯坦铜业公司、国家铝业公司、矿产和金属交易公司和印度石油公司的股份。这些举措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大动作。

应该看到，最近几年印度的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慢，卢比汇率急剧下降，股市市值下跌严重。国际社会甚至出现“印度神话破灭”、“印度经济面临穷途”的声音。不过不可否认，在过去的 20 多年时间里，印度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综合国力已经进入世界十强行列，经济结构和和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信息产业引起世人关注，开放性经济取得重要进展。2012 年 4 月 19 日，印度《经济时报》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称，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计算，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尽管人们还是习惯于用汇率法排列各国实力的顺序，但这样的排位对于提振印度人的自尊心而言确实起到了某种兴奋剂的作用。

印度为什么直言“向中国学习”

客观地说，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许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令全世界为之赞叹的成绩。当然中国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发展的质量、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以及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等，都需要通过极大的决心、不懈的努力加以改进。必须肯定，印度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上和中国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这一点，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多次在内部讲话中都直言不讳，甚至在不少场合公开提出“向中国学习”的口号。他在 2008 年 5 月访华时发表演讲说：“印度十分钦佩中国经济发展业已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事件之一，作为中国的最大邻邦和朋友，印度对这一重大进步不能不受触动。”今年 3 月，曼莫汉•辛格在南非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表示，印度钦佩中国的发展成就。众所周知，曼莫汉•辛格是一位经济学家出身的政治家，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印

度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曾经担任财政部长，一直被认为是印度经济改革之父。正如他的一些幕僚所说，作为经济学家出身的总理，曼莫汉•辛格博士对数字比其他人更敏感。他深知那些宏观经济数字差距的含义。早在 2007 年，印度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就说过，“我们希望在基础设施方面模仿中国”。国际著名经济学家莫汉•古鲁斯曾向印度政府建议，印度的战略性经济政策应该“以中国为鉴”。

经济改革的时间差。中国自 1978 年就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印度是在 1991 年才开始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两者相比，原来的经济基础虽然各有千秋，但基本的水平相差无几。那么改革起步的年份有早有晚，自然会有不小差距。这一点，至少说明双方改革起步的时间有明显的早晚之分。

经济增长的速度差。在过去的 35 年里，中国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 9.8%，在世界所有大的经济体中是绝对是一骑绝尘，遥遥领先。没有哪个大的经济体能够保持如此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两三年前，当印度短时段的经济增长冲上 9%的台阶时，一些西方的媒体出现了印度赶超中国的舆论，认为“印度神话”将很快超过“中国故事”。近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有所降低，其中既有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因素，也有经济结构矛盾的制约，还有中国政府主动调整的成分。即便是这样，2012～2013 年，中国 7.8%的增长率还是超过印度 5.3%的增长率。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如果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印度相当于中国的 2.3 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印度的 43.5%。但是印度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实行“管制”和“半管制”的经济体制，增长十分缓慢。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初的 30 年时间里，年均增长速度仅为 3.5%，被称作“印度教徒增长率”。整个 80 年代，印度的增长率有所提高，达到 5.5%。1991 年，由于国际收支危机，印度被迫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经济出现明显进步，整个 90 年代的增长率达到 6.4%的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近十年来，印度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很大释放，印度的经济增长在 2002 至 2012 年间，平均增速为 7.8%，是增速仅次于中国的大经济体。如果按照印度的资料，其中 2004～2005 年度至 2008～2009 年度，年均增长 10.3%。，即按年分别递增 9.1%、10.6%、11.2%、10.9%和 9.7%。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印度的增长率受到不小影响。2008～2009 年度增长率回落到 6.7%，2009～2010 年度为 7.2%，2010～2011 年度为 8.5%，虽然该年度农业增长率仅为 0.4%，但由于采矿业和制造业增势明显，分别达到 6.9%和 8.8%，所以经济表现仍很抢眼。2011～2012 年度，印度增长率下降为 6.5%，考虑到整个世界经济的严重不景气，这个速度还是可以被认可的。2012～2013 年度，印度的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达到近年来的最低值，为 5.3%。尽管这是一个令众多发达国家艳羡不已的速度，但已经大大低于印度政府的预



期，是过去十年来最低记录。应该说，自 1991 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经济年均增速为 7%，2004 至 2008 年间甚至高达 9%，充分展示出印度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经济数据的水平差。根据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的资料，2011 年，中国人口为 13.44 亿，印度为 12.02 亿，中国为印度的 1.12 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7.30 万亿美元，印度为 1.68 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总值的 10%和 2.3%， 中国为印度的 4.35 倍；中国钢产量为 6.95 亿吨，印度为 7220 万吨，中国为印度的 9.65 倍；中国铁路营业里程为 9.3 万公里，其中包括近 7000 公里的高速铁路，印度铁路为 6.4 万公里，数量为印度的 1.45 倍，质量明显高于后者；中国公路里程为 408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8.5 万公里，印度为 260 万公里，中国为印度的 1.57 倍；中国航空旅客周转量为 4517 亿人公里，印度为 6700 万人公里，双方差距巨大；中国外贸总额为 3.64 万亿美元，印度为 7475 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 4.87 倍；中国出口总额为 1.899 亿美元，印度为 2965 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 6.40 倍；中国进口为 1.7434 万亿美元，印度为 4510 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 3.87 倍；中国外汇储备为 3.2028 万亿美元，印度为 2719 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 11.78 倍；中国利用外资 1240 亿美元（不含香港引进的 830 亿美元），印度为 276 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 4.49 倍。

从 2012～2013 年度的最新数据来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8.3 万亿美元，印度为 1.95 万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 4.26 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 6176 美元，印度为 1624 美元，中国为印度的 3.8 倍。谈到印度何时能够赶上中国的问题，经济学家莫汉先生持有相当悲观的态度。他说："印度和中国能够在国内生产总值上齐头并进吗？如果如此，印度到 2025 年的经济增长率需要达到 11.6%。直至 2050 年，印度必须保持 8.9%的年均增长率。可能我们许多人都无法活到那一天去亲眼见证了。"有人曾经假定，如果以 201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基数，印度经济以年均 9%、中国经济以年均 7%的速度增长，要想达到两国人均 GDP 水平持平，需要 103 年。

人类发展的指标差。中国公共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35%，印度为 0.94%；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70%，印度为 3.90%；中国婴儿死亡率为 1.31%，印度为 5%，孕妇死亡率按每 10 万例活产婴儿计算，中国为 30 例，印度为 212 例。从上述数字来看，印度与中国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据报道，印度五岁以下的婴儿死亡案例为 166 万，其中 40～50 万死于痢疾。据调查，印度的婴儿死亡率达到 7.6%，而这一指标在俄罗斯、中国和巴西分别只有 1.6%、2.4%和 2%。从 1970 年到 2004 年，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从 0.254 上升到 0.611，同期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则从 0.372 上升到 0.768。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承认："在多数衡量生活水平的社会指标方面，例如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平均年限和免疫接种率方面，印度与中国的差距都在拉大，而非缩小。"印度前海军司令阿伦•普拉卡什不久前在访问上海后发表文章，认为由于治理糟糕，印度在每一个衡量发展和进步的指数上都落后于中国。11 综观印度独立以来的经济

进步与差距，著名历史学家拉马昌德拉•古哈在印度独立 65 周年之际发表文章称，在发展问题上，“骄傲和耻辱各占一半”。这说明，印度在与自己纵向相比的时候，可以感到骄傲，但在与中国等国家进行横向比较的时候，就感到了很大甚至是巨大的差距。

印度的深层次无奈：制约发展的若干因素

应该看到，近年来印度经济发展在不少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有些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与参考。例如，印度拥有引以自豪的政治制度，拥有实效运作的议会两院，拥有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拥有良好的英语教育，拥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拥有比较严格的金融管理，拥有富于活力的人口结构（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25 岁，35 岁以下者占人口的 65%），拥有声誉颇佳的信息产业，等等。但是，人们也必须看到它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尽管有些弊端在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它们的确是印度快速前进的严重羁绊。

政府决策低效。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绝大多数民众普遍接受现行的政治制度，对政府的决策随时受到反对党和民众的监督制约感到自豪。我们不能说印度是一个早熟的或不成熟的民主国家，但其决策效率确实不如人意。印度现有 85 个大小政党，往往出现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党魁利益高于政党利益的倾向。就经济政策决策而言，很多看起来很好的提议却遭到抵制，无法变成政府行为。特别是近年来印度的政治生态出现复杂局面，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取得议会多数的席位。由此形成的联合政府难以推动经济自由化的重大改革，结盟小党的政治压力常常迫使领导人推迟或取消原拟出台的政策。正如一位有识之士所说，“福利项目和民粹政策是吸引选民的保证，政府更担心短期生存的问题，如何困难决定都抛之脑后”。由于党派众多，自然会形成印度社会特有的各种“分利集团”，导致整体利益遭受侵蚀，政府决策能力和执行效率大打折扣。很多情况下，不是政府没有制定详尽的发展计划，往往是实施计划的能力非常脆弱，呈现出“功能性无政府主义”的局面。

产业结构偏差。印度实行改革之前的 1990-1991 年度，三大产业的比例分别为 29.6%、27.7%和 42.7%。到了 2000～2001 年度，这种比例变成 22.3%、27.3%和 50.4%。而 2011-2012 年度，这种比例变成 13.9%、27.0%和 59.0%。15 众所周知，印度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十分发达，被认为是仅次于美国的另一个软件超级大国。应该承认，它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该产业所能吸附的劳动力十分有限，仅为数百万人，无法满足扩张猛烈的就业市场需要。另外，作为一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印度制造业不能迅速扩展，不仅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更无法提供保证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发展的后续潜力将大打折扣。

能源资源短缺。印度是一个能源贫乏的国家，国内的产量远远满足不了迅速发展的需要。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印度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很高。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能源缺口日益加大。尽管其煤炭储量在世界排名第四，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但其高效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明显短缺。2007 年，时任石油部长艾亚尔宣布印度的石油储量达到

16.6 亿吨，比此前的数字增加了 1 倍以上。即便这样，人均储量还不到 1.5 吨，尚不到世界人均储量的四十二分之一。随着进口石油的数量激增，加之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猛涨，印度消耗了大量宝贵的外汇资源，现已超过每年 1000 亿美元的水平。有人说，印度每年软件出口的全部收入不过 750 亿美元，仅够支付石油进口三分之二的费用。2011-2012 年度，印度的石油消费量为 1.96 亿吨，而国内生产尚未达到 2500 万吨，其余 1.71 亿吨都要依赖进口。也就是说，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 87.3%，预计 2020 年前后将达到 92%左右。可见，能源问题绝对是印度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

社会矛盾激化。 在过去的 20 多年时间里，印度的经济发展取得不小成就，但是两极分化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大量人口仍处于贫困或相对贫困的状态之中。印度媒体报道，2010 年仍有 3 亿多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每天不到 1 美元）以下，3.5 亿人口生活在相对贫困线（每天不足 2 美元）以下。其中，表列部族的贫困比例达 81.4%，表列种姓人口的贫困比例为 65.8%。16 而按照 2011 年 3 月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印度的贫困人口高达 8 亿，占全国人口的 66%。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北部和中部那些所谓的“病态邦”（包括北方邦、比哈尔、拉贾斯坦邦和中央邦），贫困人口的比率更是居高不下。17 印度农村的贫困人口由于生活无着，自杀率逐年攀升。大量涌入城市的穷人特别是低种姓的穷人大多聚居在条件十分恶劣的贫民窟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印度的豪富们往往一掷千金，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

在“龙象共舞”中和谐共赢

相对于印度而言，中国在经济发展的绝大多数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还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的排位仅在百位上下。中国梦的实现不是以印度为坐标，我们需要向前看，需要盯着遥遥领先的领跑者，在全球经济的马拉松竞赛中不断缩小与先进国家的距离。在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上，我们既需要自信，又需要虚心，还需要合作。中国虽然已经领先于印度，但是应该看到对方也有不少优势和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能五十步笑百步，只看到对方的弱点，看不到自己的毛病。

人们经常把中国比作巨龙，把印度比作大象。龙象共舞，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也将是一个共赢的选择。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象脚可能会碰到龙爪，龙爪也可能抓伤大象，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只有不断磨合，了解对方的关切，妥善处理悬而未决的问题，建立彼此的政治互信，减少相互间的猜疑，深化彼此的合作，双方才能成为一对相对和谐的舞伴。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Co-China周刊

主编：方可成

编辑：王陶陶，夏景

设计：潘雯怡，池春荣，季文仪

校订：季文仪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